

## 《记忆》125期

### 目 录

#### 【要有光】

启 之 胡杰和他的版画——“祖国”：Fatherland & Motherland

江芬芬 我的杰——他用纪录片和绘画来总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 【上海文革】

李 逊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后记

（附录）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目录

#### 【札 记】

胡庄子 读萧军日记（二）——日记中记述的延安的“负面”现象

邵小鹰 谢静宜的回忆与“七·二七”事件

#### 【访 谈】

阿 陀采写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二）——山寨插队

#### 【述 往】

海 鸥 大串联见闻（一）——农业学大寨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八）——雨村的日子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七）——乱世读书

#### 【简 讯】

韦 陀 《当代中国研究》征稿启事

梁幼志 复旦大学召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谢静文 《马思聪蒙难记》在香港出版

####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六）

#### 【读者来信】

1. 袁洪权谈124期之得失 2. 孙沛东谈李南央之文

【要有光】

## 胡杰和他的版画

——“祖国”：Fatherland & Motherland

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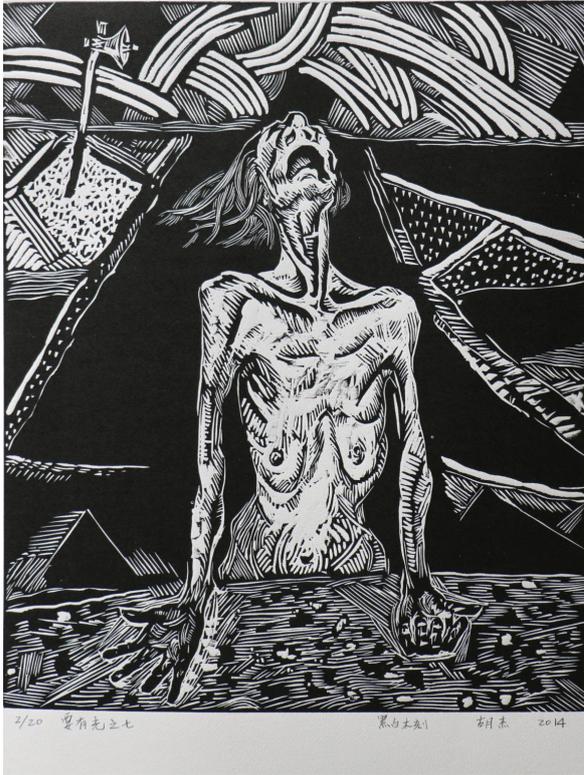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有很多怪现状：作协云蒸霞蔚，王力雄和他的后继者却决然退出；画苑红红火火，李斌与他的同道们却不与之伍；雕塑界轰轰烈烈，严正学同他的追随者却甘愿守着“双雕”寂寞终生；出版社禁书无数，勇闯禁区者仍前呼后拥；中国独立影像展在南京举办了十年，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身边的胡杰，而胡杰对这类名利场亦心如止水。然而，不管他多么低调，却还是名满天下——中外知识界他视为“中国的良心”。

人们只知道他是独立制片人，知道他拍了32部纪录片，知道《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粮食关纪念碑》等著名作品都出自他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画家。这也是怪现状之一例——他的“要有光”系列版画在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仅展出两天，就被迫关闭。

胡杰的版画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祖国”，一个是“大饥荒”。“大饥荒”是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生活的具体展示，“祖国”是对中国之命运的哲理性思考。

胡杰告诉我，“祖国”在英文中





有两种写法，一个是 fatherland，一个是 Motherland。用父亲和母亲来喻指祖国，是一种特别完美的表达。

胡杰说：“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的祖国是强壮而丰厚的。他有着富饶的土地，广袤的山川，奔腾不息的江河和丰富的资源。因此，我在父亲的脸上刻上了良田、麦子、飞鸟、游鱼、走蛇等等。父亲的一只眼睛，充溢着滋养人类的水。一丛粗壮的树根从父亲头顶上长出来，生机勃勃。这一切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祖辈生息繁衍的财富，它寓意着祖国的历史。但是，我

们还有另一个祖国，一个在表面的繁荣下面，隐藏着重重危机的祖国。因此，我又刻了一个‘Motherland’。过去，人们都习惯于把母亲塑造得很丰满，很漂亮、很强壮。因为她哺育了中华儿女，生养了 56 个民族，孕育了悠久丰厚的民族文化。但是，我觉得，我笔下的这个母亲应该是瘦弱的、痛苦的，衣不遮体的。她代表了现在的中国——空气被污染、土地被沙化，资源被浪费，矿藏被掠夺性开掘；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爱慕虚荣。没有明天，没有后代，没有安全感，为了眼前的利益杀鸡取卵……。面对着这一切，母亲祖国无奈以至绝望。她摊开双手，欲哭无泪，仰首问天：‘老天爷呀，老天爷，中国怎么成了这样？！’”

胡杰不善言辞，但他那平实的阐释，却令人深长思之——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得到了表彰，《寻找林昭的灵魂》被主流视为“负能量”。舌尖与心灵的差异，量出了主流与支流之间的距离。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地带。绝大多数人都在这里讨生活。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变幻着面孔，在或真或假中服从与纠结。主流与支流的冲突，中心与边缘的对峙，庙堂与民间的分歧，为怪现状增加了一大景观：混乱与浑沌。

栗宪庭为胡杰的画做策展时，提了三个字：“要有光”。光是昼，暗是夜。光，区分了混乱与秩序，浑沌与清明。■

【要有光】

## 我的杰

——他用纪录片和绘画来总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江芬芬

杰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聪明、智慧、超脱。但他又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很多毛病，软弱、胆小、单纯、理想化、神经质。他一直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他既是艺术家，又是将军。将军不断地给艺术家下命令，艺术家一旦接到命令，就马上变成了一个忠诚的战士。将军命令艺术家攻占一个山头，艺术家就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如果这次没有牺牲，将军就会命令他攻占第二个山头；还没有牺牲，就继续攻占第三个山头。他永远都有新的任务。

杰最不怕的是困难，最怕的是自己松懈。只要有一天没有做点事，杰就会懊恼甚至于发火。杰总把时间抓得很紧，对自己要求近于苛刻，总是不断给自己目标。战士以执行命令为天职，艺术家以良知为命令，敏锐的感觉和良知催促他前行。只有坚守得住，才能达到自己定的目的。这里，你可以缺少才华，缺少智慧，缺少能力，缺少灵感，总之你可以什么都缺乏，唯独怕的就是缺乏坚守，缺乏内心的独立。那就不可能到达艺术的顶峰。

杰的纪录片已经抵达了孤独的彼岸。想到杰当年离开单位，一个人游离于体制之外，那是何等的艰辛啊！那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最艰难的是精神上的孤独。他没有朋友，没有人交流，不被人们知晓，更不被社会理解。就是一个人背着机器行囊，坐着最便宜的火车、汽车，行走在山川旷野之间，回到家就一头埋进电脑和书籍资料中。杰要还原被遮蔽的历史，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打捞出来。

杰对生活没有要求，一块烧饼一碗面条就满足了。穿衣服也一点不讲究，我俩常常坐在汽车上，看看自己，再看看周围人，个个穿得都比我俩好，我们相视而笑。他有件皮衣服，穿了十几年，破得不行了，可还要穿。我没办法，只好让我妈去缝补，因为我妈妈的针线活好，补得让你看不出来。衣服里面补了一层又一层，以至于在人多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脱下来。我说现在的乞丐也比你穿得好，

他笑着说，它可以进博物馆了。有些衣服我给他补了，他说我补得不好看，就拿过去像模像样地自己补。可是，杰唯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从不吝啬：电脑、硬盘、光盘、磁带等等，只要是需要，也不和别人讨价还价，付钱就拿走。

他工作时那种认真劲头实在让人感动。每一次外出采访之前，杰会把最细微的事都想到，出发前把途经的路线图都画出来，几点到达，几点采访人家。采访前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和书籍，需要采访什么内容都做好记录，案头工作充分细致，井井有条。我说，杰你干事真仔细。他说那是他当飞机机械师时训练出来的。他说每一架飞机要检查，上千个零件螺丝怎样拆下来就要怎样安上去，若有一丝差错那就机毁人亡。这样的训练养成了他认真仔细工作的习惯。

独立做纪录片以来，由于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所有的拍摄、编辑、采访、文字、字幕、配音等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到各地采访，路途有时很遥远，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每项工作都必须预先想到、准备好。采访完回到家里以后，杰就开始紧张地制片。制片的过程是再创作的过程，需要智力、体力、精力。买了电脑不会编辑，没钱请人教，就打电话请电脑公司的人一边在那头讲，一边笨手笨脚地学。过后把整个过程记在本子上，再反复试验。要是有个朋友懂点电脑，他就急忙请到家中来，询问各种平时积累下来的问题。他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有时为了一帧画面，能几十遍地调来调去，让人又急又烦，可杰还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听，一帧帧地反复改。他工作起来就是这样，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他。

杰永远都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充满着创作欲望。他每次外出总要带一个本子，记事、绘画草图都在上面。他拍摄的对象、对历史的思考、西藏人的精神、大地山川，等等，都在他的脑中。用他的话说，我满脑子都是绘画。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画画。有时坐着编片子久了，他就站起来画画。他是用画画来休息。

他的片子编好后，给一些朋友看，朋友问他，这些片子无法在电视媒体上传播，也就是说没有回报，你想过吗？杰淡然地说，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其他的我没想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就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纪录片和绘画艺术上。他想用纪录片这种形式来总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他不断地前行，孤独地前行。杰内心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要做什么。他坚定，从没有动摇过。

杰从小就喜欢绘画。上高中时，跟随一位被迫还俗的和尚朱墨林先生学习中国绘画。我就是在那儿和杰相识，并和他一路走到了知天命的今天。■

2013年4月

【专稿】

##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后记

李 逊

### 与《大崩溃》的关系

20年前，我曾与肖关鸿合作，撰写了一本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大崩溃》（台湾时报出版社1996年出版。当时书上署名的只是我一人，另一作者肖关鸿没有署名）。书还没出版，我便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久，书出版了，我却对这本书很不满意。在国外看了国内看不到的中外学者对文革的研究后，我感觉自己过去的研究，完全是以文革思维批判文革，将这场由体制和更深层文化等原因造成的社会灾难简单化，甚至叙述语言都是文革式的。换句话说，我在那本书里，未能挣脱半辈子被牢笼禁锢的思想。再者，由于资料的缺乏，在《大崩溃》中我只着重写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撰写整个十年的上海文革历史，始终是我的心愿。

在作为访问学者期间，我与伯克利大学的伊丽莎白·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合作，撰写了《无产阶级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 –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国 Westview Press 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不久我女儿高中毕业，到美国求学。我必须承担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于是，好几年内，我离开了研究，一直打工供女儿读书。但心底的愿望挥之不去。终于，女儿读研究生时能够借钱读书，我决心回国继续文革研究，重写上海的文革。

此时，国内政治虽然依旧，甚至倒退，但资料比过去丰富得多了。一是被判刑的当事人基本都已出狱，许多我一直纠结的历史细节，总算有询问对象了。二是市场开放程度更大，许多当年传单的保存者，将传单和资料放在网上拍卖；另一些收集者则集中收购这些传单，许多人的资料非常丰富。三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大，一些当年的工厂、行政机构例如主管局、行业公司被纷纷撤销，大量文书档案被当作废纸流向废品回收站，废品回收站转手卖给了一些资料收藏者。这些

差点被作为废纸的档案，蕴藏着大量历史密码。四是新的有关文革的回忆录不断发表出版，提供了大量资料；国内不能出的，就在香港和台湾出。这一切，使我下决心，重新写一本关于上海十年文革的书，重点放在运动史。对于上海十年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内容，由于又是一个大题目，加上我在这方面知识不足，所以基本没有涉及。

如果本书的内容与《大崩溃》有出入，以本书为准。此外，这本书中的好几个章节，都曾在《记忆》、《华夏文摘》等网上刊物发表。但发表后，我又做过一些修改。如果本书内容与发表过的章节有不同之处，也以本书内容为准。

### 资料来源

本书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来源：

第一类来源，是文革时期的文字资料。

首先是文革中的报刊和出版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以及文革中出版的书籍。

其次，是上海地区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刊物、传单，包括《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以及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数量非常大。这里就不一一枚举。

其三是文革中的文书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各种简报、情况摘编等等，包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文和有关简报，以及工总司和以后的工代会和上海市总工会的档案，例如工总司传单集，工总司所作的大量统计调查资料，还有徐景贤、王成龙、叶昌明等人的工作笔记，等等。还有近几年因行业关并撤转，流向废品回收站的大量当年的档案，包括行业简报、情况交流、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个人日记、个人档案、交代揭发、财务报表、调查统计，等等，大都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其四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编写的各种大事记，例如：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 1967 年 11 月编写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1967 年 3 月编写的《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上海柴油机厂“大事记编辑组” 1967 年 4 月编写的《上海柴油机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工总司1967年5月编写的《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上海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写的《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等等。还有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文革中编写的各种大事记。这些大事记由于距离所记载的事件时间较近，所以至少在时间和事件过程的记载方面，离史实较近，所提供的关于时间和参与人物的资料比较准确。缺点是真正的动机往往被掩盖在套话大话下面。

其五是文革中的讲话、揭发交代和检查，例如文革初期曹荻秋、陈丕显等的讲话，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等的讲话，以及耿金章、戴祖祥、孙福祥等1967年被王洪文关在看守所时的交代。又如曹荻秋、陈丕显的检查，马天水、王少庸、梁国斌等市委干部在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揭发。这些揭发交代，有的刊登在《大会专刊》上，有的被编成小册子。例如赤卫队主要领导成员1967年初的交代，被工总司编纂成小册子《臭名昭著的赤卫队》。还有文革后笔者得到的一些当年的交代，包括关于赤卫队的交代、关于中串会的交代等。由于都是当时的文字，所以史实比较准确。

第二类来源，是文革后的清查资料及判决书。这方面的资料，一是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印发的宣传资料，其中包括《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到之五，上海警备区编写的《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等文革中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交代，等等。还有许多当事人在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期间的交代材料以及揭发材料，也都属于清查资料。由于审查时都是针对每个具体事件，所以这类资料的内容比较系统集中。缺点是当事人为减轻牢刑，不乏迎合审讯人员引导的不实之词。此外，由于只追查“篡党夺权”，所以内容比较狭隘，不足以涵盖整个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

第三类来源，是文革后当事人的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力、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聂元梓、阎长贵、吴德、汪东兴等的回忆录，关于上海的有陈丕显、徐景贤、朱永嘉、陈冀德、沈福祥、吴中杰、马达、周纯麟、红鸥等的回忆录。还有许多回忆文章。此外，许多红卫兵和当年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也都是

重要的资料。因为数目太多，不一一列出。我自己，也搜集了一些上海文革当事人的未刊回忆录。

第四类来源，是文革结束后笔者对文革当事人的口述访谈。这些当事人是：安文江、包炮、卞全、陈阿春、陈卜昌、陈宪珍、陈渝、戴立清、戴祖祥、丁德发、范佐栋、冯军、高建国、高静慧、顾达、管宇春、何是、何秀文、红鸥、侯邦琪、黄浩清、黄金海、黄树森、黄涛、黄星生、霍达、吉传仁、江必雄、姜桂鸿、金小峰、金祖敏、劳元一、李东生、李功佐、李家齐、李剑钰、李小明、林耀华、连世玉、廖颖、刘浩德、刘政明、卢沂生、马骥、马立新、苗生元、闵孝思、缪财生、潘国平、秦根富、邱励欧、施国钧、施惠珍、施尚英、石鼎、石文德、史丽枫、宋有福、宋永毅、唐文兰、田书尧、屠伯森、汪湘君、王曾元、王腓利、王明龙、王绍玺、王秀珍、王玉玺、王知常、王珠山、魏威、文贯中、吴林深、吴文虎、吴中杰、肖白、萧木、谢鹏飞、欣鼎亮、邢文举、徐景贤、徐美英、徐敏、徐泮清、许国良、许锦根、许小昆、薛海翔、严宁、杨小兵、叶昌明、游雪涛、余子道、俞胶东、郁鸿卿、袁尧舜、袁义永、张宝林、张伯生、张扣发、张水荣、张小坊、张永前、张振学、赵全国、周铁荣、朱锡琪、朱永嘉，等等（其中有些口述回忆，是笔者与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金大陆教授一起采访的）。

第三、第四类资料来源，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细节，以及当事人当时的思想动机；对许多史实，往往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情节成了“罗生门”。而且由于当事人思想的变化，回忆和叙述中的动机与当初的动机可能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与其它资料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资料互相比照。

第五类来源，是文革后有关单位编写的资料，包括系统和单位的文革大事记、地方志、组织史。这都是上级有关单位统一布置的，调用了大量的文革文书档案，以及文革后的清查资料。不过，文革大事记一般不对外开放，很难看到。而地方志，由于遵从当局的“文革从简”原则，除了金大陆撰写的《上海青年志》文革部分，绝大多数地方志的文革部分，都过于简单。而且因为是官方修史，必须遵从主流价值，因而回避了许多重要史实。

第六类来源是文革后的资料汇编。其中最重要的，首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文库》。此外，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也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还有逢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等等。一些网上发表的资料汇集，例如水陆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第七类来源是历史著作。其中对我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至少到我这本书完成之时，觉得国内还没有一本研究文革的著作能超过它。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王海光著《新秩序和新冲突》，史云和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踪迹》，金大陆著《正常与非常》，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等等。此外，海内外学人研究文革的著作十分重要，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许多论著也颇有价值。因为数量庞大，需开列的书单太长，这里就不详细罗列。

从匮乏的资料中发现历史，是非常累人的事情。不过，历史本来就是由各种真实、半真实或不真实的碎片组成的。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乐趣，就在于通过各种碎片接近真相。

## 致 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热情无私的帮助。在此我向所有对我提供帮助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那些文革的当事者，他们接受了我的访谈。他们的回忆，补充了文字资料的不足，使得历史鲜活生动，让我弄清了许多长期不明白的关节点。我尤其要感谢当事人对我的信任及包容。书成之后，我尽可能地找到书中所提及的主要人物，请他们核对事实。许多当事人知道我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他们不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但表示：他们希望和要求的，是理清史实，至于怎样评价这段历史，是作者的权利。也有些被采访者不愿留下名字，笔者只能作技术处理，望读者谅解。

我也感谢向我提供资料的许多热心人，尤其是陈国康、林鸥、樊建政、徐建刚、李晓航。他们花了大价钱搜集文革传单、小报，却无偿供我使用。我书中的

许多重要史实即来自于他们提供的资料。许多时候，这些文革中的文字资料，可与当事人的回忆相比照，对于接近历史真相，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还要感谢其他对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吴由之、李东生、周丽娟、陈君慧、袁福佐、石鼎、杨沪生、杜晓政，等等。他们或为我打字，或为我修改和校对文字，或为我查找资料，或为我寻找当事人，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朱学勤、吴一庆对我的书，从结构、理论到叙述方式，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严搏非则热心地为我联系出版社。

同代人写史，最难的是与自己曾亲身经历的历史保持距离。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经历和情感，会干扰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自幼所受教育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顽强显现；另一方面是因为史料的不足。当事人的回忆、档案的挖掘和整理，都需要时间。尤其当今的中国，许多档案不开放，长期保密；加上当局对研究的设禁和阻挠，更增加了难度。真切希望知情人和研究者，能对书中的差错加以纠正。

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的研究只能是初步的。如果这本书能够为后人的研究起到铺路的作用，就是对我所付出艰辛的最好回报。

#### 附：关于本书引用较多的部分重要历史文献或资料的说明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文革中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在1967年11月编印。从内容上看，所引资料似乎有许多来自上海市委当时的办公文书档案，例如市委或市人委的简报，也有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据说当时负责审批群众小报印刷的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曾看过底稿，说虽不赞成其观点，但事情都属实，签字同意排印。大事记起讫时间为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23日，原件约10万字左右，16开铅字排印本。现已经由宋永毅编入文革资料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在1967年3月编写。“反经”总部成立于1967年1月10日，于3月17日撤销。撤销前，整理出这份记载总部活动的大事记。大事记详细记录了经济主义风潮时上海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经济困境，所引资料大部为“反经”总部当时的会议记录、内参等办公文书档案。原件为16开铅字排印本，约2万多字。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现已由宋永毅编入文革资料库。

####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这本文献汇集，是工总司办公室资料组1967年7月开始征集资料，最后汇编成册，起讫时间为1966年11月至1967年底。收集了工总司自成立到成书时的所有传单，包括布告、通告、通令、通知，等等，按传单的出版时间编排。是研究工总司的重要资料。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我的检查》（陈丕显），《我的检查》（曹荻秋）

这些资料是1967年召开的一系列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以及上海市长曹荻秋批判大会上的发言，发言者都是上海部局长以上干部，也有市委副书记们；还收入陈丕显、曹荻秋当时写的检查。原件为16开铅字排印本，没有注明编印者。笔者估计是王承龙负责的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编印的。

#### 《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工总司1968年10月编写，原件约6万字。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工总司关押和审讯了许多赤卫队负责人。这份资料，是当时被关押的赤卫队总部和区、局分部的一些负责人，被审讯时写的交代材料的摘录汇编。此外还有一些上海市委负责人如曹荻秋以及市总工会主任张祺等干部的揭发和交代的摘录。此资料没有正式印发，原件为24开铅字排印的校样，似乎没有校对过，因为文中错字误排颇多。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

这本大事记是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组织人编写，徐景贤亲笔作三次修改。引用资料多来自当时市革委会的有关简报及其他文书档案，此外还参考了大量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同时，编写组还多次召开座谈会，搜集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并对文字资料进行核实。因此大事记在史料方面较为详实。大事记详细记录了上海一月革命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夺权经过，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资料。大事记的起讫时间为1965年11月至1967年2月。共6万多字，原件为8开铅印清样。大事记写成后，徐景贤将清样分送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看时作了多处记号和修改，但要求徐景贤不要再付排，而且要求将已经印出的也全部销毁。之后，徐景贤遵嘱将全部底稿、记录、资料及印刷版子等一并销毁，只留下三本清样。文革结束后，从张春桥、徐景贤的办公室中查出两本。现分别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以及中央档案馆。

#### 《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这本大事记是王洪文文革前工作的工厂上海国棉17厂（后改名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写，原件约5万字。大事记详细记录了文革初期还是一名普通保卫科干事的王洪文的活动，是研究王洪文以及上海文革时期群众运动的重要资料。大事记的实际撰写者是新华社上海记者站的工作人员，1974年至1975年奉命往上棉17厂为王洪文写传。引用资料为该厂1966年的会议记录等办公文书档案、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抄件以及座谈会记录和采访。原件为16开打字油印本，文革结束时大都被销毁，只剩几份，分别存于上海第17棉纺织厂、上海纺织局、上海市档案馆以及中央档案馆。

####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一到之三）

这份资料，是文革结束时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1976年12月到1977年9月编纂。大都是当事人的揭发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档案资料。共约17万字，内容主要是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曾下发到基层并向群众宣读。

####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

(之一至之五)

这份资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纂，大都是当事人的揭发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档案资料。共约40万字，内容主要是文革中发生在上海的各类事件。曾下发到基层并向群众宣读。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南京军区于1979年3月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上海警备区撰写《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上海警备区于1979年3月组织人员成立了编写组。全部资料共三册，第三册的内容是文革中的上海第二武装，约38万字。其中包括文革中的文书档案、照片，文革后的揭发批判材料。还有两份大事记：《“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始末》，《“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纪事》。原本为十六开印刷合订本。整本资料线条清晰，内容翔实，是研究文革时期上海民兵的重要资料。

《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于文革后的1983年9月编写。原稿3万多字，为16开打字油印本。此资料编写前，正值上海市委为文革中上海保守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平反不久，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编写了这本资料。执笔者王一鲁、陈其贤都是当年的赤卫队员：陈其贤是赤卫队总部文字秘书，王一鲁是《解放日报》社的赤卫队负责人。他们多次召开原赤卫队总部及各区负责人座谈会，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编写成这本资料。虽然最终没有按原定提纲写完，只写到昆山事件，但赤卫队最重要的活动诸如成立经过、与中共上海市委的关系、康平路事件等，都已包括。原件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2年编。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清查上海的文革派，留下大量当事者交代、揭发和证词。清查结束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觉得让资料沉睡可惜，组织部分曾参加清查的工作人员，利用清查档案编写了这本史话。虽有些许差错，但资料极其丰富，缺憾是资料来源全部

没有注明出处。原稿约60万字，16开铅字排印本。本打算公开出版，但编成时正值1989年风波以后，未被允许，以后一直没有出版。■

(附录)

## 革命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 目 录

前言：革命名分的诱惑

思路与方法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分”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分的关系

文革中的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之争

第一章 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江青来上海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被毛泽东欣赏的张春桥

“金棍子”姚文元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北京市委的反应

张春桥收集学术界反应

“要害是罢官”

锦江饭店南楼会议

《二月提纲》与上海

姚文元再批《三家村》

小结

## 第二章 斗鬼风：被转移了的文革方向

上海批判八个专家学者

批判牛鬼蛇神高潮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委向全市派工作队

斗鬼风蔓延上海高校

小结

## 第三章 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

上海的破四旧

红色恐怖

有组织的大抄家

抄家风蔓延

小结

## 第四章 北京红卫兵冲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

炮轰上海市委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和杨富珍急电

市委门前的工人造反派

周恩来的三点指示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小结

## 第五章 造反派红卫兵：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复旦伤风，上海咳嗽”

红卫兵领袖：

劳元一

安文江

马立新

最初的造反派红卫兵

复旦：上海三大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发源地

红卫兵造反组织在全市兴起

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

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小结

## 第六章 工厂里的造反派：最初的造反原因

工厂文革从上海开始

工厂基层干部王洪文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劳动模范王秀珍

团支部书记金祖敏

党龄最长的耿金章

小青工潘国平

五好职工黄金海

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叶昌明

退伍军人陈阿大

临时工戴立清

培养对象谢鹏飞

最初的造反原因

小结

## 第七章 工总司成立：艰难的公民结社

毛泽东要求工厂开展文革

工总司筹备会议

工总司的诞生

抢红布行动

宣言、海报、袖章和大旗

市委的“三不”方针

工总司成立大会

上北京告状

小结

#### 第八章 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上）

安亭拦截火车事件

中央讨论安亭事件

陈伯达电报

张春桥赴安亭

文化广场谈判

毛泽东支持张春桥

张春桥为什么签字

苏州谈判

北上告状的工人全部回沪

#### 第九章 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下）

市委会议上的分歧

安亭事件突破中央规定

市委调查王洪文等人

创建《工人造反报》

工总司总部最初的分工

工人造反派的构成

小结

#### 第十章 工人赤卫队：文革遭到强大阻力

二七战斗队

市委与上海工人保守派

三个组织合并为赤卫队

工人中的老保：

王玉玺、陈阿春

马骥

李剑钰

赤卫队迅速发展

洪双寿事件和色织24厂事件

小结

### 第十一章 解放日报事件：工人造反派取代红卫兵

聂元梓以常溪萍为突破口

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

工总司支援红革会

赤卫队与工总司的较量

市委再次妥协

马天水转变立场

占领者撤出报社

小结

### 第十二章 写作班造反：市委心脏爆炸

写作班的由来

市委干部徐景贤

大学讲师朱永嘉

党支部书记郭仁杰

大学教师王知常

朱永嘉宣布“我要造反”

写作班召开全体会议讨论

徐景贤终于下决心

市委机关联络站串联成立

写作班宣布造反

小结

### 第十三章 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上）

市委转向支持造反派

赤卫队被抛弃  
张春桥告诫造反派  
耿金章赴现场指挥围攻  
上海第一场大规模两派冲突事件  
“抄张春桥家”事件  
康平路事件中的工总司

#### 第十四章 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下）

昆山事件  
“三停”事件  
造反派强行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员转变观点  
小结

#### 第十五章 接管《文汇报》：一月夺权的开端

毛泽东生日祝酒辞  
陈丕显签署《急告上海人民书》  
造反派筹备打倒上海市委  
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上海  
《文汇报》被接管  
《解放日报》和上海电台被接管  
张春桥、姚文元与工人造反派见面  
造反派宣布罢免陈丕显、曹荻秋  
毛泽东高度评价《告全市人民书》  
陈丕显希望与造反派合署办公  
小结

#### 第十六章 经济主义风潮：革命口号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最初的经济主义要求  
全国临时工组织的成立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

回乡职工要求迁回户口  
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  
小商小贩也造反  
市委节节退让  
香山路会议  
港务局首先补发钞票  
体制内职工的经济要求  
上海经济生产危机  
经济风中的工总司  
小结

#### 第十七章 中央贺电：上海为毛泽东的文革找到出路

《紧急通告》的产生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铁路造反派接管调度所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毛泽东要中央向上海发贺电  
保守派全面崩溃  
造反派取得决定性胜利  
小结

#### 第十八章 一月革命：从“接管”到“夺权”

红三司接管公安局  
上三司接管上海市委  
毛泽东支持群众夺权  
张春桥传达毛泽东讲话  
造反派酝酿成立“新上海公社”  
上三司再夺市委权  
红革会夺市委和华东局权  
张春桥回顾上海夺权

小结

第十九章 1.28 炮打张春桥：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式微

复旦三派红卫兵打派仗

炮司贴出大标语

市红革会犹豫，复旦红革会积极

复旦红革会绑架徐景贤

张春桥被围攻

工总司保张春桥

毛泽东口授中央文革急电

上海红卫兵运动式微。

小结

第二十章 公社的成立与改名：回归秩序和权威

毛泽东要上海成立公社

毛泽东指示上海三结合

耿金章成立第二公社

张春桥化解危机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毛泽东建议公社改名

从公社到市革委会

小结

第二十一章 解散“兵团”：王洪文整合工人造反派

迅速发展的二兵团

二兵团、一兵团、工三司和野战兵团

王洪文尝试合并未成功

《第五号通令》风波

兵团被各个击破

清除内部反对派

潘国平被审查

双造司和新工总司

王洪文一统工总司

小结

## 第二十二章 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上柴厂两大派组织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名分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市革会支持东方红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解福喜事件

“G号行动”

市革会的态度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委会送《公开信》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4 砸联司大武斗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小结

## 第二十三章 4.12 炮打张春桥：来自军队的警告

张春桥未出席大会引猜测

二军大“红旗”发端

北京传来的消息

文汇报社成立炮打战斗队

4.12 炮打

工总司保张春桥

江青解救张春桥

秋后算账

小结

## 第二十四章 从大联合到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中央要求学生回学校军训

外地红卫兵撤离上海

毛泽东称赞市六女中大联合

市中学红代会成立

中申会：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异端

《红卫战报》被三次接管

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大学红卫兵的大联合

大学红代会成立

上山下乡结束红卫兵运动

小结

## 第二十五章 从工总司到总工会：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体制化

1967年初的上海职工造反派组织状况

贵阳经验和归口联合

“倒旗”联合的困惑

整顿区、县、局联络站

“脱钩”与“归口”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

毛泽东提出以工人造反派组织改造工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

工总司总部组室设置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工人造反报》停刊

工总司改名工代会

工代会改名上海市总工会

小结

## 第二十六章 从干校到“战高温”：科层的“革命化”

从“公社”到市革委会的建制

三军座谈会事件

上海解放干部的模式

市革会人员构成

小班子和大班子

五七干校、战高温和四个面向

陈丕显、曹荻秋专案

被“三结合”的新干部门

市革会与军队的关系

小结

## 第二十七章 从专题写作组到市委写作组：秘书化的知识分子

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

郭仁杰自杀

王承龙与“11.10事件”

炮轰南京路事件

《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

“小钢炮”陈冀德

工人作家肖木

王承龙出局市革委会

小结

## 第二十八章 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的实践

公安和司法系统被夺权

从文保会到政法指挥部

任意抓人的开端

造反组织代行公检法职责引出混乱

上海公检法系统被军管  
上体司治安组“打击流氓阿飞”  
文攻武卫指挥部“刮红色台风”  
游雪涛的第二情报机构  
小结

**第二十九章 十万工宣队员进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28名“工代表”  
上海最早的工宣队  
市革委会派出十万工宣队员  
工宣队与市革委会部门合署办公  
从师院开始的高校大搜查  
“三工”的矛盾  
工宣队的困境  
小结

**第三十章 清队、一打三反和清 5.16：回归自上而下**

从文艺界开始的清队  
胡守鈞小集团案与一打三反运动  
清查 5.16 分子  
三场运动的严重后果  
造反派被整肃  
小结

**第三十一章：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领地**

总工会的碰头会和兼任制度  
“工会领导权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工会要抓大事  
会费、会籍和工会财产  
恢复工会传统活动  
建设工人理论队伍

小结

### 第三十二章 市委写作组：张、姚在上海的舆论总管（上）

市委写作组的成立

因事设组的构架

张春桥、姚文元的忠实追随者

奉命写作是写作组的基本任务

编写大事记，汇编资料集

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依据

标注“大字本”

市委常委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群众歌咏大会以及知青函授教育

### 第三十三章 市委写作组：张、姚在上海的舆论总管（下）

写作组编辑出版的书籍

写作组的刊物

《摘译》和《教育实践》

《自然辩证法》

《学习与批判》

《朝霞》及其丛刊

小结

### 第三十四章 批林批孔：身份的焦虑

文革始终遭抵制

市总工会批判“两个否定”

徐景贤解释一月革命遭批判

造反派重振军威

上海批林批孔急刹车

小结

### 第三十五章 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上）

新干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

毛泽东关注王洪文

奉调北京学习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受命负责王维国专案

毛泽东抛弃王洪文

新干部们：王秀珍

新干部们：金祖敏

新干部们：黄金海

新干部们：叶昌明

新干部们：陈阿大

新干部们：戴立清

### 第三十五章 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下）

挡不住的诱惑

186个老头头调查

被重新起用的谢鹏飞

几上几下的潘国平

其他老造反的文革经历

小结

### 第三十七章 “《朝霞》事件”：话语平台的纷争

总工会与写作组互相看不起

《朝霞》事件

张春桥、王洪文出面干预

张春桥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接见陈冀德

总工会办刊物受阻

小结

### 第三十八章 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

“东方论坛”反对否定一切的批判

《一切为了九大》以“阶级关系变动论”解读文革

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垄断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质疑唯阶级论

王申酉全面系统否定文革，批判毛泽东

小结

### 第三十九章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武装的尝试

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民兵指挥部

改造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改造民兵：“三位一体”

改造民兵：“二部合一”

上海警备区与民兵的关系

王洪文的民兵思想

小结

### 第四十章 毛泽东逝世：最后的捍卫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毛泽东逝世引发上海对局势的担忧

马天水被召往北京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民兵指挥部、总工会和写作组分头行动

徐景贤和王秀珍被召去北京

总工会和写作组主张起义

工会系统层层“吹风”

上海庆祝文革结束

尾声

小结

### 附录一：本书提及的部分干部文革前夕的任职情况

附录二：本书提及的部分文革人物的情况简介

附录三：本书中提及的文革中上海全市性群众组织的情况

附录三：文革时期上海市革委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妇联名录

后记■

【札记】

## 读萧军《延安日记》笔记（二）

胡庄子

无论从敌军或友军射来的箭，箭是一样的。

……我是要从这些伤害的刀丛中行走的，  
过去，现在，将来也均要如此。……

当然我还是以一个文学者的眼睛  
看一切，是有些欠妥。<sup>1</sup>

——代题记

### 日记中记述的延安的“负面”现象

日记记载：看见那些坐汽车的人，很威风，觉得鄙夷。（40-9-3）昨夜看晚会回来，忽然一辆汽车呜呜地叫着从人群后面冲过来了，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去了。当时使我感觉到好像从我的心上这样冲开了一条路，我和这坐汽车的人有了区别。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但我不知道这车里是坐的什么人？那车底前后左右是爬着拿着枪的人。接着是一队骑马的人从人群中走过去了。在外面这

<sup>1</sup> 摘自萧军《延安日记》（42-7-24）

现象是普通的，它除开引起一种无可奈何的憎恶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在这里除开这下意识的感情以外，还有了一种惋惜和怜悯。但我知道坐在汽车里的人是不会想起这些的。（41-4-24）

他说：这里的人是把旧社会可憎恶的渣滓带进了革命里来，他们还发酵它，掩饰它。（41-6-19）

他记录了延安的不公平现象：（1）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2）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1-6-24）

萧军记录了夫人对他说的话：“老百姓们，看见我们同志把很多吃不了的饭全喂了鸡，他们心疼死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落下一粒饭也要拾起吃了啊！这里却喂鸡！’”夫人还告诉他：“（帮工的）老太婆因为儿媳不容她，曾两次出来到机关帮工，可是当她一看到那些‘太太们’的神色，她就冷了，她宁可在家里吃苦。”萧军说：这引起我对于这个政党前途茫然的一种恐惧和悲哀，仅是在此，我就看出了那衰败的、腐化的现象，那将来一定要不可避免地演出一些悲哀丑剧的。（42-7-24）

青年作家柳青从绥德回来了，同他谈说了一些地方上的情形。萧军在日记中记录了下来：“整风运动在延安还像样，外边就马马虎虎了……地方的人民第一个感到负担重，一个地主，有一年出过150石租粮的，收的租粮不够，就卖地买粮缴纳……因为是四六减租啊！……地主与贫农苦，中农好……下级干部贪污腐化，‘老一套’……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对于共产党本希望能好些，如果和国民党一样，他们就失望了……对法律不满，如果有案件不公，他们就到处说……妇女工作困难……百姓怕自己的女人开通了离婚，被人调戏……他们不乐意被选举，选举上是认为倒霉的事，边币和法币矛盾，公市二元换一元，黑市二元五换一元，人民不信任边币……。报纸只有区党部宣传科长看……争取中农及大地主底合作是基本政策……发展资本制度……”听了这一番话，萧军有感而发：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在办法上实施资本主义化，在思想

和行动上不真正的工农化,它的前途是可恐惧的,它就不容易获得到人民。无计划,无方针,不能贯彻始终……这是共产党目前最大的缺点。这会使人民想到,即使共产党获得政权也是差不多啊!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最艰难的党!(42-10-2)

萧军把伙夫老牛的牢骚也记在日记中:“我今年四十九了……每天第一遍鸡叫就起来,实在是吃不消啊!我要退伍了,有乡亲不会冻着饿着……我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补充团……我为革命,难道还想升官发财么?这一个月三元钱,还不够买半两烟……我一个月要吃四两烟……秘书长怪我菜做不好吃啦,没有材料,没有油怎么做啊?他们监视我,其实我除开猪肉,什么肉也不吃……,我家里也有老婆、女儿……但是我不回去,也不打信啊……”(42-10-2)萧军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早晨散步的时候我预感到,这个党是没有阶级基础的党,虽然它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它也想和这个阶级成为血肉,但我总感到它是悬空的,它虽然新兴不久,已经看到了败落的现象,这使我很悲痛!(42-10-3)

他批评说:一些无能之辈尽以例行公事、刻薄等来代替工作。我们共同感到,一旦有了正式政权,有了“所争”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耻、可卑、可丑的现象出现着。总之中国革命是长期性的,更是心灵的革命。(41-6-8)

他说:这里新兴的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全具备着这社会本有的恶德啊!(42-2-17)他说:对于这里的人,越来越感到难以容忍了,他们是自私而卑俗,官僚气到处浓厚!我真想离开这里了。……我知道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41-2-15)他说:我对这些人总存着不容易消除的隔障,他们是公式的,事务的,我是人生的,艺术的。我在这样环境中是永不会被理解了,我将死了心,静静走自己的路。(41-11-12)

他参加了延安的民主选举,他写道:从这选举中我懂得了政治!这绝不是讲良心和公道的地方,这和商场一样是讲资本和机巧的。这使我对于政治更绝了趣味。对于从事政治的人,也更感到了厌恶,无论他们是从事什么政治的,总之我不爱他们。从此我更知道了,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应时时以实力,眼前的利益为目的。(41-11-20)他说:外面有什么,此地有什么,古有什么,今有什么,不过换换样而已。41-12-11

萧军在延安这样“革命”的地方,感到痛苦。他写道:在中国社会里第一个条件就要“忍”!我忍啊!含着近乎羞耻的眼泪,和这卑俗的队伍行进啊!我还

要帮助和改造他们！这是矛盾的，痛苦的！因为只有这个队伍，还是比较可以在一起行走啊！（41-12-7）

萧军看延安的男人与女人。他说：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他们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自己工作的岗位，随着丈夫“光荣”去了！我愿意把她们比作“月亮”，她们自身是没有热力也没有光辉的。蓝苹，孟庆树，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作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骄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40-8-19）延安现在正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42-1-25）

他说：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她们爬上去就像一个癞蛤蟆似的蹲在丈夫的光荣上，怎样想法肥胖自己，舒服自己了！……他们利用革命特殊的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通的，他们利用女人还没强健起来的弱点！——虚荣和享受。（40-9-18）

他说：延安男多女少，大致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他说：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42-2-20

他说：边区尽养了这些流氓，对于革命不会有多大用处的。（41-2-11）

他冷眼看去：看着这里的人，每天在开会：三五个人在一起噉噉噉噉……真有点看不惯。每个人全像一只狗似的嗅着另外一个人的伤痕，残酷地挑剔着。——但这有是必要的啊！这里不能有浅薄的“温情主义”啊！（43-6-15）

他说：凡是到一个“机关”我总是做好十分的精神准备，准备那些无知的人们粗暴和可怜官僚气的待遇。（43-12-11）

他到乡下居住、种地之后，他看到了延安郊区、延安之外的情形——

当他第一次走进村长家时，村长家的小儿子把他当做“公家人”，脱口问道：“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他发现公家对于老百姓，只有索取，没有给予。

他写道：离延安仅只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宣传底不深入，不普遍，不经常，形式主义……是充分表现着。（43-11-27）

他写道：这里离延安仅20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人们办事

真是缓慢得惊人。(43-12-8)

他认为：这里的人民对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感觉啊！(43-12-10)

他观察到：这里的乡村和我过去的家乡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烟和赌博到处暗流着。(43-2-15)

他说：有些老百姓，如果国民党来了，稍稍用之怀柔政策，他们会一样服从于他们的。我们的政策没到乡村来——一般的百姓并不晓得施政纲领……等类的——他们只感到出公粮的义务，不知公粮的用处，出到什么时候，和外面比较少……(44-3-4) ■

【札记】

## 谢静宜的回忆与“七·二七”事件

邵小鹰

清华社区网上，近有同学摘录了“七·二七”事件核心人物谢静宜的回忆，她披露了当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过程和重要的细节如下：

7月24日毛找谢静宜布置，决定派两三万工人去宣传，至于先去清华还是北大，请北京市商量定。并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谢领受任务向张荣温、迟群传达，回部队向杨德中汇报，又一起向汪东兴汇报，之后找北京市领导，决定先进清华，7月27日进入清华，遭到武力对付。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汇报给毛和市委领导。毛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于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打掉了五大领袖的气焰。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叶海亚送给他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8月15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的代表。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

——摘自《作家文摘》2015年1月13日第一版，选自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谢静宜的回忆是可信的，它戳穿了毛假装糊涂的演技，或“不知情”的说法。派几万人去清华，是毛背着中央下的一笔大赌注，是他指挥文革换马的重大战略行动。在打这么重要的一仗时，毛会去睡大觉？或对战况浑然不知？他不是告诫“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吗？看来毛是预计会流血，也“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并被“不断的汇报”而及时得知了流血、死人事件，而这一切正是他所策划、所期待的结果。待毛拿住了确凿的把柄，然后才召见五位学生领袖“问罪”，让他们及所有知识分子“无言以对”、不得不俯首臣服他“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英明决定”。

谢静宜的回忆，支持和补充了笔者在《七·二七之谜》一文中的推测。■

【访谈】

##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阿陀 采访撰写

1968年7月，是中国文革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月份：

- 7月3日，中央颁布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
- 7月24日，中央再颁布针对陕西和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
- 7月25日，中央接见广西两派代表。
- 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工宣队进驻清华。
-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其中两个最后通牒式的“布告”和两次厉言疾色的“接见”讲话，都和同在7月召开的“北航黑会”有多多少少的前后关系。



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广州“红旗派”头头武传斌（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朱仁一起）7月中下旬在北京航空学院联手召集的一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简单说，就是“7·3布告”后更陷入绝望困境的各地造反派坐到一起交换情况并探讨出路。

中央高层通过“记者特务”（戴维提语）第一时间掌握了会议详情并为之震怒。几天以后，针对全国造反派的（上图：武传斌）“7·24布告”颁布，是不是和“北航黑会”有直接关系无从而知，但紧接着“7·25”周恩来及中央党政军高层几乎倾巢出动召见广西造反派赴京代表，厉言疾色追查此一“黑会”，却是不争的事实。

周恩来在会上点名：“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并当众宣布“‘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康生重复周恩来的话后，更进一步点明：“‘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

这等同宣布两广造反派，乃至全国造反派的死刑。

三天以后，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长达5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心就是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特别点了“北航黑会”：

“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谈话中毛泽东还两次使用了“围剿”一词：

“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自“7·24布告”和“7·25讲话”、“7·28讲话”以后，文革以来军队一直坚持的对群众组织“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何时候都不开枪的原则180度转变，军队全面出动，武力拔据点，荡平山头……有限度开放了两年的“结社自由”从此不再。群众组织在实现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归口“大联合”以后，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1968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3年文革群众运动正式宣告结束，进入“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的后文革时期。

1968年7月的“北航黑会”，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长期以

来，除了一位会议参与者，“广西四二二”钱文军写过一篇回忆《从“北航黑会”到“7·25”始末》，以及原“北航红旗”头头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其中一章谈到“关于‘北航黑会’问题”，几乎就没有见到任何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学者的研究文章。

为此，笔者多次了专题采访当年会议的主要主持人武传斌，综合整理并经武先生反复修改以后，遂成下文。

## 第一部分：武传斌自述

关于“北航黑会”，有人说是1968年7月16、17、18号共开了3天，第一天是在清华开，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也参加了，第二才转到北航。这是不对的，因为会议实际只在北航开了两天——18、19号，蒯大富只是在18号北航会议第一天出现了一下。

17号在清华开的是碰头会，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的预备会，是小型的，“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贵州……”一共二三十人。我印象很深。清华蒯大富的代表陈岩开头出现过一下，大概坐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我是主持人，这我清楚。

### 1. 7月初上京告状

“7·3布告”出来后，军队全面出动武装扫平山头，广东造反派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7月初，我和“工联”邱学科、“广州工人”林基球等一共七八个人，带着海陆丰、阳江、封开、怀集还有海南白沙……等广东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广铁总司”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软卧间，人都集中在那里。火车到韶关，军队上来查票，赶了一百多人下来。出发前我已经通知省军管会（报备），他们是知道的，可能是想以查票为名把我们截下来。

下车后，站台上的“主义兵”挥起武装带打人。当时我和邱学科、林基球在一起，都是“草头王”，也没有什么警卫员。（上图：武传斌在天安门前留影）皮带向我抽过来的时候，林基球挡在我前面，眼睛差点被打瞎（林后在“清队运动”时跳楼自杀），后来军人过来制止了。一百多人被关在饭堂，互相都不认识。最后军人问我：“你是不是武传斌？是不是要上北京？”我说是。他们大概是请示黄永胜后（应有记录可查），就让我们重新上车了。



## 2. 谢秘书说：“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

大约是7月10号到了北京，先到北航，11号就给周总理的谢秘书打电话，算是报到。第二天（12号）我去了中南海后门，通报后谢秘书出来，我递材料给他，他接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

（阿陀：当时他真的这么说？）

当时他真是这么说的！

把材料交上去。谢秘书答应一定转给总理。这样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既然到了北京，自然还想见总理，所以就没马上走。

## 3. 召开全国造反派串联会的起因

我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北航红旗”原来“驻广州联络站”的站长郑焕成，安排在北航落脚住下。文革前他是北航学生会主席，参加过广东省革联“一二二夺权”。我每次来都是先找他，我们和北航的关系很好。他不能直接带我见韩爱晶，还得通过“北航红旗”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段孔莹，才到北京体院见到了韩爱晶。

和韩爱晶谈话时，我希望他能把广东的情况反映上去，他们有渠道，地位也不一样。韩答应反映，不过他也向我吐苦水：“北航红旗”日子也不好过，只是

比你们好一些。北京情况比较复杂，好比蒯大富要借枪，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虽然我们在北航一统天下，还是感受外部压力……

然后我见了蒯大富，很普通的见面，主要还是请帮忙反映广东情况。这时都还没想到开会的事。另外还分别见了王大宾和谭厚兰。这样，除了聂元梓，其他四大“学生领袖”都见了一遍，主要表达的意思是：

现在全国造反派都处在受压状态，而且很厉害。文革的气味不对，造反派要完蛋了（用高翔现在的话讲，当时我们都处在“垂死挣扎”状态）。在我带去的材料里就有，海陆丰几千军警包围一个五六千人的一个村子，动用机枪迫击炮攻进村，估计死亡几百人。还有广东阳江、海南白沙以及肇庆西边和广西交接的封开、怀集等。当时沿西江一直出海流到香港的大批尸体不仅是广西的，也有广东封开、怀集的。

和他们见面时都还没想到开会的事，主要还是请帮忙反映广东情况，当时这个会在我脑海还不存在。

我还见了来京（告状）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是通过广西“四二二”头头朱仁联络的。

（阿陀：你除了递交材料，希望见总理，原来有没有也在北京见见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打算？）

没有！当时完全没有！那是后来见到朱仁以后才形成的想法。我和朱仁原来不认识，去到后才认识的。发觉他们比我们更惨。我觉得把两广的材料集中一下，一起反映上去，这样也许比较可行。这是最初的想法。

广西“四二二”住地在和平里，那是一片十几栋七八层高的居民楼群，没电梯（当时规定超过11层才可装电梯）。这种苏式楼层过道是大走廊，楼梯也较宽，因而楼梯底空间较大。当时走廊、楼梯底、阳台甚至公厕到处都住了人，还支锅做饭。看见大人小孩衣衫破烂，有的妇女衣不遮体……像一群难民，真是惨不忍睹。至于为什么会安排广西人住那里，我就知道了。

当时还有全国各地进京反映（受压）问题的其他造反派，分散住在各地。朱仁的作用就是联系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见面就诉苦。大家见我来了，希望我能找人往上反映。我的人脉比较广，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不想见，其他以前都见过，也能见到。我到了北京就觉得全国造反派都很

惨，情况远远比广州恶劣。最后我提出：“请朱仁联络各地造反派头头，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所以会议确实是我发起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就决定在清华碰头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于是我也就成了主要召集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后来这么恼火的原因。

#### 4. 会场为何从清华改到北航？

17号为什么选在清华碰头开预备会？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见蒯大富，见他和见其他人不一样，大家觉得他往上能说得上话。本来以为在清华开碰头会时他也会来，但是到了清华，陈岩来了一下，说找不到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联络不是那么方便。当然也可能就是故意回避。陈岩坐了十来分钟就要离开，我请他转告蒯大富，希望他能出席明天北航的正式会议。陈岩答应：“我去跟老蒯说”。果然第二天老蒯在北航会场露了面。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陈岩只是作为清华的代表，主人，过来看看，表示表示，不算参加会议。

当时清华两派武斗正打得很厉害，到处乱糟糟的，于是商量改地点。

（阿陀：这里我还可以补充点背景材料。1967年7月我也到了北京，正住在清华园一处中立的学生楼，就是逍遥派学生宿舍。我们几个同学听说全国造反派在这里开会，便到处打听情况想参加，结果什么也打听不到。当时每天进出校园，校道上常会见到穿着击剑铠甲，手持磨尖钢管（长矛）的学生武斗队伍，也看见武斗双方都利用双层床的床架，两边绑上生胶条，做成“大弹弓”，夹上砖头从窗口射向对面的楼……）

第一天只是碰碰头，我们想开的是一个“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大家商量结果，这个会第二天改在北航开，由我去北航联系。我当天晚上回北航，找了段孔莹商量这事，也说了请韩爱晶出席，还希望她能帮忙能找到蒯大富出席。段很快答复说开会地点没问题，可以在北航开（她可能当时请示了因病在北京体院休养的韩爱晶）。段本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但是韩一直没有露面。我也给谭厚兰打了电话，她表示不会来参加。

我还再次找了“地质东方红”王大宾。他说你们到地院开，我一定来。但北京分“天派”“地派”，他们“地派”和北航、清华势不两立，如果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蒯的影响比王大，我宁愿在北航开，这事是我定的。我和不了这个稀泥。这样表面上就变成“天派”比较支持我们。其实“地派”也支持，只

是他们坐不到一块去。我记得开会时王大宾还是派人来了，只是在会上表现不大明显而已。在地院我还想见朱成昭，忘记因为什么原因没见成。

#### 5. 只是“诉苦会”，并没成立什么“联络站”

（阿陀：你们召开“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引起的后果？中央早在1966年底67年初就明令取缔全国性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

你讲的是对的。全国造反派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有几千人，各地的人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常常这样聚在一起，说是开会也可以。我们开座谈会也只是一种串联，当时串联是合法的。1967年初取缔全国性组织起因是“反经济主义”，我们并没有打算成立什么组织，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会一开完，中央马上就知道了。有人报上去的。

我们开这个会，主要也是困境下造反派互相支持，造造声势，引起中央的关注。有说会上成立了“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这是没有的事。

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提议，是18号下午3点左右，会议差不多结束时“辽宁八三一”提议的。“辽宁八三一”这个组织开始是得到毛远新支持的，关系很密切，后来毛远新改变态度了。1969年他当了沈阳军区副政委，整起“八三一”一点都不手软。“辽宁八三一”是很积极参加这个会的群众组织，我们早就知道毛远新支持他们，很奇怪现在为什么连他们也受压也要上京告状啦？

（阿陀：犯忌讳了）

谈到这个话题，蒯大富的代表陈岩不出声，很快就溜了，是不是回去请示老蒯我也不知道。我也征求韩爱晶的代表侯玉山的意见，他说：“哎呀，这事可能我们也不敢担啊，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后来他也走了。当时我说：这怎么弄啊？要是真的要成立，那就看老蒯能不能牵头了？提出成立联络站的事比较突然。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事挺复杂的，得征求井冈山陈岩他们的意见，而且这事也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得由北京的造反派决定。再说我们广东的事已经够头疼了，我也不想揽下来。但是我不想直接得罪各地造反派，结果这事就成了有议无决，没有形成决议。我只是建议大家留下联络方式，以后彼此多联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散会了。

整个会议我和朱仁是主持人，但我很少发言，就是让大家讲。各省争着发言，都很激动。广西“四二二”代表发言控诉了他们受严重打压的情况，当时韦国清

已经动手了，抓了不少人。他讲的时间比较长。另外还有也是来自广西的柳州白鉴平介绍他们造反派“成功”的经验。各地发言主要是诉苦。

北航18和19号两天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北航第一天上午。他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当时会上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 6. “北航黑会”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北航黑会”，使得中央、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翻脸，导致造反派的覆灭。我认为说这个会是一个转折没错，但毛泽东抛弃造反派，整治造反派不是从这会开始的，前面有“7·3布告”，布告原则就是针对造反派的。

（阿陀：前有“7·3布告”，后有“7·24布告”、“7·25中央接见广西两派讲话”和“7·28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讲话”，“北航黑会”这前后关系太微妙了！）

中央抛弃造反派，下手解决造反派的方针是早已定下来了。这从“7·3布告”已经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北航黑会”，也一定会这么做，只是时间可能迟一点而已。“北航黑会”不是我个人错、罪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借口，起了“催化”作用，可能催化了“7·24布告”，也催化出“7·25讲话”和“7·28”毛的接见。

“7·24布告”是针对全国的。而“北航黑会”，我坚信只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之前，已经一个个文件不停地下。“7·25”中央接见广西两派，会上就大讲韦国清上报的黑材料，什么坏事都是“四二二”做的。这些材料都是准备很久的了，不是因为“北航黑会”。当时韦国清是政治局委员，这些话，无中生有的东西，还通过周恩来的口讲出来。

“北航黑会”原来只是一个串联会，放在一年前不会有问题，只是赶上这个时候了。“7·3布告”选突破口就是广西。“7·25讲话”里面有很多“炸药包”，每一个爆炸出来都有很大杀伤力。其中两个炸药包和我有关，一个是“反共救国团”，另一个就是“北航黑会”。这样，对全国造反派的扫荡镇压就正式开始了！

（阿陀：1968年“7·3布告”和“7·24布告”之前，两年文革，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和地区，军队都严格执行不准开枪的命令，包括1967年夏天“全面内战”，武斗中各地纷纷抢夺军人武器装备，那样的情况下，军队都没有开枪

镇压。但1968年7月这两个布告颁布以后，马上就不同了，不是开几枪那么简单，是出动军队武装镇压，围剿扫荡，铲平山头。）

背后是毛下决心要结束文革，要整要杀。整谁杀谁？当然是拣软的下手。整保守派整不下去，因为背后是强大的干部和军队。只有牺牲造反派，才能做到。先是利用，然后打击，现在已没有利用价值了。

毛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说明他要开始整造反派头头。他口中的“错误”，就是指走向对立面，往这一挂，就完蛋了。

（阿陀：这个决心——抛弃造反派结束文革的决心，是在武汉“7·20事件”以后开始的。1967年8月，因为“八一社论”号召全面“揪军内一小撮”，毛突然意识到把军队推到对立面的巨大危机，悬崖勒马，改弦易辙，牺牲造反派的后台中央文革三员大将“关、王、戚”。我在北京访问过江青秘书阎长贵，对他的回忆中提到中央宣布对关锋、王力审查处理时，江青流泪的细节特别感兴趣。“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点，是在1967年9月中央下发的文件《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

当时明的就是要开杀戒，工宣队、农宣队不过是政治攻势，还是需要杀一批。一月夺权后马上就反扑了，“二月逆流”已经让毛尝到苦头。才安抚下来。7月陈再道再闹，知道严重了，差点走不掉，军队成建制包围宾馆，相当于“逼宫”。不相信“八一社论”毛没看过，说是关锋、林杰搞的，他们不是这个位置，也没有这胆量。重大节日的社论都要让毛看过，签发。我们其实也知道不会成气候，迟早要走到这一步。

我从参加筹建“省革筹（阿陀注：即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于1967年11月，武传斌当时为核心小组成员）开始，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很压抑。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复课闹革命，人心都涣散了，归建制了。群众运动从来不会持久，不管什么精英掌权，什么建制什么结果。

#### 7. 周恩来为什么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

北航的会开完，我也就准备回去了。没马上走，原因还是想见总理。

这次找谢秘书的时间是离开北京以前，约20号左右（前后两次都是晚上八点多。周恩来一般都是下午休息，晚上8点开始工作，秘书也一样。早了很难见到）。见到谢秘书，把广东新送来的材料交给他。他出来，我交给他，提出希望

见总理，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讲开会的事。开那会在我当时看来只是一个串联活动，稀松平常，并不当一回事。他好像也还不知道。谢秘书收了材料只说了一句：“你快回广东吧”。我就明白见总理是没希望了。至于开会的事周恩来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清楚。

我刚好是在火车上听到广播“7·24布告”的。离开北京时布告还没出来。所以7月25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突然翻脸，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如果他不用这个说事，他原来对我们的支持，就改变不了啦。

（阿陀：要找台阶下。）

而且要一下子把我们打到不能说话（申辩）的地步。

（阿陀：不管无中生有也好，指鹿为马也好，他都可以有个交代是吗？）

对了。他知道党历来只要搞了谁的专案，下情就不可能再上达了。这一套他们很懂的。所以他干脆就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天大的帽子。周恩来讲“总团在广州”，康生就起来讲“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人家当然理解武传斌就是了。其实广州军区、军管会很清楚我不是，但老百姓不清楚啊。当时造反派内部也有两派三派，也有矛盾，无非像老百姓一样，恩恩怨怨，但是一旦把你打成“反共救国团”，所有人，包括你自己的人，都枪口一致对付你了。虽然谁也不知道武传斌是不是反革命头头，大家还是一起控诉你。“总团在广州”和“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是连起来讲的嘛，分开来又不一样。他就是要用这个理由打散你，如果不是这样旗派不会散啊。打不散旗派，周恩来就还有责任，他没法交代，因为之前他跟我们的接触，讲那些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后来，1974年那次接见（阿陀注：指“批林批孔”运动中，赵紫阳和许世友接见原群众组织代表），赵紫阳敢当场大声问：“武传斌在不在”，他心里应该是有底的。

赵紫阳秘书1974年曾经告诉我，周恩来去世前有一次曾对赵紫阳说过一句话：“武传斌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话我没有，也不好当面向赵紫阳查证。但不管怎么说，就算是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不是我不判刑的根据。李正天和王希哲的回忆都提到过，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曾经准备在全省批判我，后来形势变化不了了之。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有判刑的，但我没判刑啊！我被抓来抓去坐了

次牢，但没判刑。因为我没判刑，广东造反派头头也没一个判刑。

（阿陀：“反共救国团”团长都不判刑，怎么解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不是因为你出身好？）

不光看出身。我文革前是学生干部，党员培养对象，一直是被组织信任培养的，这和蒯大富有点不一样。

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判我刑，而是要打散造反派。

（阿陀：一下子打懵。）

打懵你，让你没有还手之力，那就散了嘛。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啊！隔离，抓起来了，你讲话谁能听见？最多是军管会抓你时别人听到，抓走了就再没人听到了。

（阿陀：这很有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反共救国团”，他也很清楚你是一个牺牲品，这是不择手段解决问题，走棋到这一步，不得不把你抛出来，不这样收不了摊。这就是政治的肮脏黑暗。另外，就算你们只是议论议论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也是犯了最大忌讳，在中央看来，等于是“另立中央”，太敏感了，肯定捅到毛那里去了，要不然周恩来不会这么紧张。）

当时就有人捅上去了。北航在场开会的人，现职现任的省革委常委就我和邱学科两个，其他的都是草莽。

（根据2012年3月24日多伦多访谈记录及2013年10月7日、18日和2014年6月5日、19日、23日共五电话记录综合整理。2014年7月经武传斌多次审阅修改认可）

## 第二部分 阿陀九问

阿陀：关于“北航黑会”的相关回忆文字记录非常有限，目前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另外还有杨继绳和闻于樵两篇，不算回忆）：

- A. 1968年7月25日中央接见广西两派的谈话记录（注一）
- B.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注二）（韩爱

晶整理，《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刊载)

C. 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 七十三章：关于“北航黑会”问题》(注三)

D. 钱文军文章《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注四)

这些文字有的交代不清，有的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前面先由当事人武传斌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现再就细节及疑点进一步求证。

关于名称，戴维提称“全国形势分析会”，韩爱晶提“串联会”，还有“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等提法，这个会议有没有一个名称？

第一个问题：会议名称是什么？

武传斌：这个会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基本上就是一个串联会、座谈会的性质。

阿陀：第二个问题，会议日期是哪几天，开了两天还是三天？

戴维提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文章说，第一天开会是在16号，地点选清华，主要是因为大家想见蒯，参观清华。戴维提还说有十九个单位参加，主要是控诉，蒯也在场。

钱文军是当事人，他回忆第一天清华预备会是17号，他没提蒯大富出席，但也说在场有不少人(“四五十号人”)，开了一整天，控诉很激烈。白鉴平介绍“柳州经验”的发言就是在清华会上讲的(而戴文说是在北航会议讲的)。

两人关于清华会的日期不一致。搞清日期，早一天晚一天都不一样，因为时间差直接关系到后面“7·24布告”“7·25接见”和“7·28接见”这几件一环扣一环的大事。

“7·25接见”有这么一段：“康生：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白答：参加一天半，18日一天，19日半天)”——这是当年事发几天后的表述，比较可靠。“北航黑会”应该就是18、19两天。问题是白鉴平是不是也出席了17日的清华预备会？(因为钱文军回忆说，他在17日清华会上大讲“柳州经验”)

武传斌：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基本认同钱文军，第一天预备会应该是17号。但不同意他说有四五十人，开了一整天，控诉很激烈，还介绍“柳州经验”这几条。人数应该没那么多，大约二三十人。也没开一整天，应该只是下午。

阿陀：看“7·25接见”记录，朱仁回答清华开会是多少人问题时，说是30

人。另外，如果是上午开，一批人应该有个如何集体解决中午饭的问题。你记得在清华吃午饭了吗？

武传斌：我和外地造反派不认识，都是通过朱仁去串联通知，陆续来的。也可能上午就有人到了清华，议论（控诉）开了，吃过饭后才把队伍拉过来一块谈。我们没在清华吃饭，会是下午开的，时间不长。白鉴平介绍柳州经验不是在这次预备会，是在北航讲的。这次开会主要是商量开一次全国造反派串联会（或座谈会）的事，等于是一次碰头会、预备会。“北航黑会”，只有18、19号两天，不包括清华的预备会

阿陀：第三个问题，是否“伪造介绍信”上京和谎称自己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

7·25 接见，周恩来说：“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

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

请问上述两件事实情如何？为什么你前面谈到12号周恩来的秘书才说过：“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两个星期不到。周恩来就撇清道：“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

武传斌：周恩来说的“伪造介绍信”和黄永胜说的“参加北京市革委会”两件事都是无中生有的，不知从哪来的，根本不存在！我怎么伪造，伪造了什么介绍信？再说，我上北京也不需要介绍信，火车票有人安排，不需要我自己去买，到了北京住北航，也有人接待……我几次上北京都没带什么介绍信。还有黄永胜

说武传斌“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这句更滑稽！真要造谣，广东跑北京，说参加人大还靠谱一些，那个“北京市革委会”，我怎么进去？我也不认识谢富治。我从来没说过这话！他们是在堆砌罪名。共产党要整治你，就会这样做。

你问为什么“7·25”周恩来态度大变？我想有三个可能原因可以考虑：

第一是毛泽东态度变了，周恩来马上跟风。最明显的例子是前面1967年8月19日接见，我在会上汇报“红警司”的情况，当时周恩来是支持我们旗派维持广州治安的，没有表态指责，还风趣地问我：你们的枪够不够？不够问黄永胜要。那口气是温和赞赏的。8月31日还接见了一次，九月初，毛签发的收缴武器的“9·5命令”出来以后，总理又接见一次，这次很严厉，说：你们要马上回去收枪（如果枪不收回来），你们是不是要取代警司？这次也一样，任何情况下，周恩来一定会紧跟毛泽东。

第二是广东作为周恩来亲自抓的一个点，现在形势变了，他不得不撇清关系。广东文革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我们造反派比较听周恩来的话，这和外地不大一样。周恩来叫收枪就收枪了，而且比较彻底，保证“广交会”顺利举行，这恐怕也是周恩来对我，对我们造反派印象比较好的原因。周恩来一直是把广东作为一个他亲自抓的试点，推行他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理念，对造反派主要还是收买拉拢，有些设想可能还来不及做下去，形势突然大变，特别是出了“北航黑会”这事，周恩来急于划清界线，保住自己。

第三也可能是秘书会错意，传错话。7月12号对我说的那一句：“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可能只是秘书个人的揣测。出来见我以前他肯定请示过总理，但他表达的意思也未必一定准确。

阿陀：第四个问题，到北京是要见黄永胜和温玉成吗？

韩爱晶在7·28接见时提到：“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这段是否属实？

武传斌：当时黄永胜虽然已经是总参谋长，还挂名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温玉成当时已从广州调到北京任卫戍区司令，副总长。他们在广州时都表示过支持旗派，我反映情况他们都很热情接待，温玉成还多次标榜他自己就是广州军区的“八

三一”。所以我对韩爱晶说他们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们到北京没去见他们。就是想见也见不到，哪里找？不得其门啊。不像找总理，还有个见秘书的渠道。我当时跟韩爱晶讲过到北京主要是想见总理，韩爱晶没提这一点。

阿陀：第五个问题，韩爱晶事前是否说过：“北京开会就是黑会”？

7·28 接见，韩爱晶说：“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开会前你见韩爱晶时，他是这么说的吗？

武传斌：这是不可能的，他当时根本没这么说！如果有说过，后面两件事就不可能，一是会场地点不可能同意在北航，二是他们也不可能派人参加。还不是一般的人，除了段孔莹从头到尾在场，侯玉山作为勤务组第三把手也出席讲话。韩爱晶后来压力很大，可以理解。在北航开会，侯玉山也参加了，追查下来，他不得不有个交代，表明自己事前是反对开会的。

阿陀：第六个问题提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还是“总部”？

钱文和戴文都提到，会上的提议是：建立全国老造反派联络站，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

7·25 接见记录有这么一段：“文元：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朱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杨继绳在《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也沿用了“总部”提法（见《昨天》2013年1月第十二期）。

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武传斌：当时辽宁“八三一”提出的是成立“联络站”，不是“总部”！如果真是“总部”，后果一定会更严重。事后追查也一直提“联络站”。朱仁大概是被追问时很紧张，吓傻了，一时口误，讲错了。真要成立“总部”，怎么搞？谁能把大家统一起来？笑话，北京自己一个天派一个地派都打得不可开交。

阿陀：第七个问题，北航祝春生是不是“做了大段指责外地造反派的发言”？当时会场上有什么反应？

武传斌：有这印象。祝春生只是“北航红旗”下面一个比较活跃的小组织头头的，就像我们“中大红旗”下面还有“117”等组织。19号下午比较后发的言，

前面的发言都是控诉什么的，他一直在听，见到没人讲军队和中央文革好话，他按不住了，起来指责。当时大家对北航比较尊重，认为北航是全国少有的造反派堡垒，所以当场没有什么人争辩反对。他讲完之后，才是“辽宁八三一”提出成立联络站。这个时间大约是会议结束前一个多小时，一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清华的陈岩和北航的侯玉山马上就走了。

阿陀：第八个问题，主持人是谁，是一个还是几个？

关于主持人有三种提法，分别是：一个、两个和三个。

戴文明确提到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都是武传斌；7·25 接见时周恩来说：“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钱文说除了武传斌，还有侯玉山和朱仁也是主持人。

武传斌：周恩来的讲法比较接近事实，这次会可以说是我和朱仁共同主持的。侯玉山作为接待方东道主，说是主持人也对，他只是讲几句开场白。我确实是发起人和主要主持人

阿陀：第九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过“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

7·25 接见，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并说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康生当场纠正他：“不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中央知道了，写个报告，争取主动”。有这回事吗？

武传斌：我没说过这话，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来的，也没打过什么报告。我们这个会主要还是议论，没有形成决议。关于成立联络站的是也是争论完了，我最后表态，大意是能不能做；怎么做，这事还得由北京造反派头头决定。说完就散会了。■

附注：

一、《1968.07.25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1968年7月26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1968年8月7日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制厂105红印兵团翻印。

二、《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韩爱晶整理，《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刊载。

三、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 73章：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http://sulin.blshe.com/post/10398/386326>。

四、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

2014年8月26日二稿

**【访谈】**

**冷卫口述（二）：山寨插队**

戴为伟 采访撰写

时间：2013年10月3日上午

地点：冷卫家

受访人：冷卫

主访人：戴为伟

记录方式：录音及笔记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好了，我们肯定只有插队这一条路，如果想赖在（城里）不去，工宣队也讲得很清楚：“你们不下乡，我们就到你们父母单位去，叫他们协助做工作！”我们这些边缘学生的父母，在各自单位也都是可以推一推或者拉一拉的边缘人物，我们谁都不敢连累父母。所以我们几个就带头写大字报，要求下乡吧。但我们写完后，没有任何动静。在我们之后的“好汉”兵们贴了大

字报后，班主任、工宣队马上到班上，说：“看，还是我们这些红五类的同学觉悟高！”这些人最后全去了农场。我们当时的感觉是：文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是我们成了最后付出代价的人呢？我们很想不通。

插队以后，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去的地方是布依族聚集区。我们四个男同学分在一个点里，那时候叫“一家”。我们去的那个生产队，布依族叫寨子（村子），寨子里有12户人家。我们四个男同学凑钱，买了12个毛主席挥手指方向（造型）的石膏像，还买了毛选毛著，完全是洗脑宣传的那一套，去挨家挨户给村民送礼物。农民由衷地高兴，我们都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高兴？只觉得，贫下中农觉悟真高！送这些东西时，男的户主在外面接东西，旁边家里的老妈妈、主妇、大点的孩子，各个喜笑颜开。我们按照洗脑教育（的指导），开始访贫问苦，（请村民）给我们讲讲以前受的苦。访了几家什么队长、副队长、贫协小组的组长。（结果他们说）：“‘粮食关’的那年我们饿死人”。我们刚下去的时候没概念，问：“‘粮食关’是哪年？”布依族的纪年是像我们辛丑年、甲午年这种说法。他们这样说了，我们还不明白，问：“那时解放前——几年？”农民讲：“什么解放前，几年！头一两年还在庆祝建国10周年，后来就‘粮食关’了！”我们一想，那不是1960年吗？！（笑）后来我们吓得都不敢去访贫问苦了。

到地里劳动，农民看到我们挥汗如雨，喝的水也没有了。农民大妈特别朴实，会走过来极同情地讲：“哎呀，看你们几个人可怜啦，毛主席不好啊，害你们下来吃这些苦啊。”跟我们概念里的贫下中农觉悟很高，截然相反。后来才知道，我们送的东西为什么农民高兴呢？有一次在地里，男性农民站成一条线刨地，那是刀耕火种的地方，男性农民要休息，只能站在那里，掏出纸卷烟抽。农民笑着讲：“哎——，你们送的这个纸还可以，不错哎”，我们过去一看，《毛选》语录的纸被他们撕下来，裁成小条，都变卷烟纸了。当然（当时）全家笑嘻嘻的。后来我才想起来，那么，石膏像呢？我没看见谁家的石膏像放在外面。当时农民家里的东西，一目了然，好东西都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没见谁家把毛主席像放那里。当时有一家农户只有老两口，没有孩子。到了村里，我们按照老规则，学习八路军，要给人家挑水做事。几个同学大概做了半年以后，不太能坚持，只有我还在坚持，人家对我也就很好了。我就敢问他们话：“我们送的那个主席像呢？”老

太太高兴的：“那个主席像好哎，等等，（你）吃点豆腐再走”，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碗豆腐，然后问我：“豆腐怎么样？”我说：“好吃！”“这个豆腐是石膏点的——，不是那个酸汤点的。”我就问：“石膏哪儿来的？”“就是你们送的主席像”。（笑）

戴：得，主席胳膊少一只。

冷：农民也知道这个话题很危险。那是很朴实的农民老太太，简直把我当她儿子，对我很好。特别跟我解释：“小冷，你不要乱想，不是我们去搞的。是那天，猫跳上台，把主席像摔碎了。我怎么办？这么好的石膏又不能扔，我只好把它存起来。要点豆腐了，就拿出一小块，在火里烧，烧到涨起来了，捣碎，点豆腐。这个比酸汤的好。”（笑）我现在（到这时候）才理解，为什么农民收到这些礼物，由衷地——高兴！结果这跟我们想的阶级觉悟高没关系。

戴：由衷地觉着这个有用。

冷：对他们的现实——物质生活，有一点点帮助。后来我才知道，农民真的很苦。我们插队的地方，地多人少，荒山多。但是耕作方法就是刀耕火种，很落后。当年有个越南电影《寂静的山林》，写的那个生活、住房，我看当时的布依族和他们（电影）里完全一样的。房子就是大竹子，用木槌砸裂，再用镰刀割成大竹片（建的）；房子的墙用竹片、竹条捆在木柱子上。燃料从山上砍木柴烧。就在那样一个地广人稀，只有12户人家的地方，老老小小大概有70口人，一年中农民大概缺三个月的粮食。他们要过红水河，到更地广人稀的广西去买粮食。农民常年吃的是苞谷（玉米）。我们那里是个生产小队，每年种上一点点水田，主要是糯米。糯米主要是用来娶媳妇，定亲，过节“打粑粑”用。他们不包饺子，但是一定要打糯米粑，这是生活习惯。每年春节过后，我们大概要吃上一个多月的白薯，只有白薯，其它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吃得胃里冒酸水，农民都吃得不耐烦。生活过得这么紧张。

我有点文化，队里要我给他们记工分。记工分时我才发现，今天两个妇女不能来，明天又有不来的。我问队长，她们怎么不来？队长告诉我，她们生孩子，大概这一个月都不会来。那么，生孩子，我们得看得见（孩子）呀，刚才说的，女社员在地头怎么休息呢？她们休息时，只有一件事——（给孩子）喂奶。小孩用破布条背在后背，在地头，草丛里，大树下喂奶，她们能休息一下。男社员只

能抽烟时，才能把锄头停下来。然后我发现，这个月有三个女社员生孩子，可怎么只看见一个女社员在喂奶？问队长：“怎么那两个人不喂奶？”队长告诉我：“孩子死了”。我才发现，那里自然状态下，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

我们那里，12户人家的寨子，每一年能出生13、14个小孩，但是能长到3岁，就只剩下三四个了；长到10岁，可能只有一个。完全因为贫穷。那个地方疟疾流行，带有恶性疟疾的蚊子一叮，孩子必死无疑。每年三月，天一转暖，我们喝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但这个水经过队里的两块水田，和田里的浑水混在一起。春天涨水，我们喝的水都是混黄的。我们知青还能从贵阳带来点明矾扔在水缸里沉淀泥土，烧开水喝。农民舍不得烧柴，就喝生的混汤水，闹急性肠炎。小孩过不来这关的，就死了。那个地方的贫穷，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农民的衣食住，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我都没想到，这里的农民会穷到这样。你跟他们聊，他们一肚子的苦，要跟你讲“粮食关”的时候，文革整人，一肚子的事。

戴：那么偏远的地方，文革也整人吗？

冷：一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这件事被我们许多同学解释为“布依族野蛮”，我觉得不是。第一次到公社去报到的时候，是星期六，我们住在公社里，还没有往生产队分派。第二天让各个生产队领我们到寨子里去。这时候就看到街上在游街，一大群民兵拿着火枪，是用打火石的那种火石枪，押着一个矮壮的汉子游街。汉子胸前挂着一个特大的白纸牌，上面写着“破坏军婚犯×××”（名字）。我们很奇怪，问公社（这是）怎么回事？公社的人不跟我们说，或者是公社的干部自己也不很清楚。等到下午游街完了，我们寨子里的队长、副队长来了，我去的那个寨子叫蚂蚁寨，我们又问队长。队长讲，那个人就在我们山后头。这个人的亲妹妹许配给的人当兵去了，这个人和他的亲妹妹生了一个孩子，布依族也是不容忍这样的事。后来，抓来斗，（认为）说坏分子，觉得太难听。后来一想，妹妹不是以前许配给军人了吗，就定他为“破坏军婚犯”。

两个星期以后，公社派地富分子跑山路送来鸡毛信。队长觉得我们有文化，让帮着看信。一看，是个油印的通知：某某寨，破坏金婚犯某某某，行凶杀人以后逃跑，要各个寨子注意，砍柴、看牛、出工、赶场（圩）的不要单独外出，至少要五个人结伴出行。这个人在家里杀了自己的老妈妈、妹妹，私生孩子都杀了，还带了火枪和柴刀，扬言要报仇，躲到山林里了。

我们总得砍柴、挑水呀，队长说，好，砍柴、挑水都固定时间，全寨人统一去挑水。我们又提出，知青总要赶场拿信，也想和其它寨子的同学聚会。队长看我们有四个男生、三个女生，说你们自己小心点，七个人一起出发应该没问题啦。

赶圩到了公社所在地，知道了详情。这个被游斗的人回家后很生气，要喝酒。当地农民用苞谷面煮饭，壳子等余下来的用来酿酒，酒糟用来喂猪。他在家喝得醉醺醺的，磨砍柴刀。妹妹觉得他神色不对，抱着自己的孩子在火塘边干活。当地的妇女很辛苦，织土布、开磨、踩堆、喂猪、养鸡、弄孩子。他妈妈在那里念叨（责备）他。这个人站起来，一刀把他妈妈头骨都一破两段。妹妹吓坏了，抱着孩子往外跑。他追出屋，把他妹妹的头也一刀砍成两半。小孩也被抓起来，砍了头。然后就站在寨子里大喊，浑身是血。原本是寨子里的队长和民兵揭发后，押着他去游街的。他大骂后回到家，把血淋淋的柴刀别在腰上，带上火枪，把自己家竹片围着、顶上盖草的房子用火把点着。寨子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然后他走出寨子，进了山林，没影了。这样各家才敢出来，赶紧往自己家墙上泼水（灭火），保护自家的房子别被烧毁。这样队里的三四个民兵跑到公社送信。然后公社才写了通知，让地富分子到各个寨子送信，因为贫下中农谁愿意给你跑山路呢？（笑）公社任何一个党内“机密”（文件），——什么国民党台湾开九大，飞来一个气球发反动传单；地富分子（按公社要求）给各寨子送信，要民兵上山捡反动传单；什么要抓人了，要开会了等等，都是他们跑来送信。这是我刚到那里碰到的事情。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地富分子又来了，送来公社油印的通知，说那个杀人的人上吊自杀，死在他们寨子背后的一个山沟里，警报解除了。我们再到公社去时，县里来的公安员都没走。

我就在想，死的这个人，是他们寨子里的民兵队长，不就是贫下中农吗？怎么解释？阶级观念和现实生活怎么统一？公社的干部为什么要让地富分子来送最机密的东西（文件）？我们印象里，都得是海娃那样的三代贫农的人，才能送“鸡毛信”吧，怎么能让地富分子来干？阶级路线的概念和现实怎么统一？我脑子里当时就觉得无法统一。到了农村我才发现，农村根本不是我们所想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到那里（会）“大有作为”？大有什么鬼作为？！根本就没有。整天和他们（农民）抢工分，农民当然不欢迎我们去了。我们四个男生是同班的，农民给我们评多少（工）分，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当时，男性农民干一天活10分，到年底分粮食，折合的钱要以全年的收入来计算。我们的收入是2毛3到2毛9（每天以满分10分计）。女农民只能算8分，折合不到2毛钱。

戴：一毛六七的样子。

冷：对。那么，农民也怕，因为公社干部讲了“同工同酬”。我们又是4条大汉，按说得跟男劳力一样算工分。农民想：你们一天挣10分，我们家里老婆孩子，孩子只能算6分；而你们又干不了什么，分粮却和我们这里分得最多的等同。农民当然很不屑。农民的办法就是多给我们找事。比如：我就成了记工员；我们（知青）的小组长，他父亲是个医生，他就成为我们寨子里的赤脚医生。这些额外的事都是不计工分的，这样农民内心会稍微平复一点。还有一些农民（体力劳动）优势很大的，比如说收小米，每个人背个筐，右手无名指上套个小铁皮做剪刀，用大拇指和食指挡着小米植株，割下小米穗子扔筐里。我们四个男生，收得最多的一个人，一天大概收六七斤；农民动作快，有些小孩都两个手套着刀，一天能收40多斤。这时候，农民改了一一称重量记工分。最后闹得我们只能不去（收割），主要是感到很羞辱——这么大一条汉子，站起来比农民高，还干不过只到我们胸口高的小孩。小孩回来都能收25斤，斜着眼看我们，心里话，你们这些大人都干不过我们小孩。所以矛盾也很大。

这样我们就感到，在农村，农民并不欢迎我们。我还算和农民很好的人，但很明显，农民从总体上讲，是不欢迎知青的。他们对个别人可以很好，寨子里很明显，农民对我和那个赤脚医生还可以。他们打了野味，还会拉我们到家里去，弄到兔子、鱼，上山弄到（蜜）蜂窝，把蜂窝里的所有花的、白的那些虫，弄一小碗，给我们。对农民来讲，能吃到一点肉，一点点动物蛋白，那时很了不得的事。有这样的东西会叫我们两个到家里去吃，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礼遇）了。所有的知青对我们讲：“嗯——，你们还去拍这些农二哥的马屁啊，还混得点什么肉吃”，知青的感觉都是太不容易了。知青在农村呆得好，是个别的，总体来说，农民反对知青来。知青当然也看不上农民了，我们同学里有这样的：“我恨不能变希特勒，把这些农民全杀光！”偷鸡摸狗广泛流行，和知青这种敌对心理有关系。农民觉得知青干不了活：“给你们评7分”。

戴：还没有农妇的分高。

冷：对，妇女都能有8分。但是一到收小米、掰棒子，一个大筐背着，重心不稳。我的筐里，最多背40斤，我走都走不稳。收粮食回来走山道，转弯快了，能把人带到沟里去。我能多背，都不能（敢）多弄。可是，农民，（连）妇女都背70斤呐！男人一个筐里可以装100斤。他们用竹叶子、席子把背筐加高。人家背100斤回来，看到我们，一是耻笑，二是农民普遍觉得不（公）平：“你才收这么点，凭什么你也算10分呢！”所以，农民和知青的矛盾很尖锐。这类事情促使我疑问越来越多。阶级路线，现实和理论脱节太大。文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结果，和“5.16通知”讲到的天壤之别。类似的问题特别多。

最后一个把骆驼压塌下去的冲击，我觉得是林彪事件。1971年，突然，公社的那些干部态度就变了。我们知青都关心能不能招工回家（返城）。我妈也从牛棚放出来了，我爸也从劳动的干校放回家了，家里正常了。父母认为我很吃苦，也有精神开始关心我。我每次从亚热带乡下回来，晒得跟黑人似的。农民缺3个月粮，我们也缺三四个月的粮。（只能）每年回家住两个月，吃在家里，走的时候，家里想方设法，给我们弄点粮票带回去。所有知青都有这个困难，不能不回家住。（但）回家住，就要开始驱赶。1969、1970两年，贵阳大规模抓人。我们家里的一个同学，就被抓来关在一个小学里。抓起来后，问：“哪的知青？”

戴：抓的理由呢？

冷：理由——你们逃离锻炼第一线。都已经报名下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为什么贪图享受，回到城里来？你们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要改造嘛。

然后，是哪里的知青，押上汽车，押到县里。县里有个“劳改队”，这是知青给起的绰号，实际上叫“收容队”。每次押回来的知青总有几十个吧，每个县都有几十个，弄在一起。县委的围墙，下雨倒了，你们（知青）去无偿干活，每天就是给一点吃不饱的粮食，特别像集中营了。这些事传出来，知青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了。知青讨厌农民，也讨厌当地的政府。公社、当时还有区一级、县（各级政府），肯定不会替知青考虑了。所以知青也觉得很难受。但是，以前他们（各级干部）都很跋扈的，见了知青，吆吆喝喝：“好好接受改造！”正常的问候语就是这个。（笑）

戴：知青相当于“二劳改”的样子。

冷：对。（恶狠狠声音）“哪个寨子的？！”

“我们，哪个，哪个寨子的。”

然后干部觉得没什么说的了：“好好改造！”就走了。

戴：哦，就算打招呼。

冷：就是。（苦笑）对女生可能不一定这样，对男生，就我见过的，我们沿着一条大河，三个队的男生，到公社赶场，都坐在一起闲聊天。公社干部过来，一看你们又坐一块儿，他们的直接反应，就是你们知青要干什么坏事：“干什么？！”（咬牙，鼻音很重地）

“不干什么，歇歇脚。”

“没事就（赶紧）走了，”（依旧咬牙的鼻音）

然后又一句：“好好改造！”

三句话。这就是公社、区的干部打招呼的方式。■

【述 往】

## 大串联见闻

### ——农业学大寨

海 鸥

继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断上京接受检阅。到1966年的9月上旬，毛泽东已经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的食宿行全部由国家承担，几千万人口在中国流动，或去煽风点火，或去取经送宝（动词后均加“革命”二字），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

先介绍一下我当时的身份和背景：1965年高中毕业。因为爷爷在台湾没有资格上大学，被分配当中学教员。先在北京师院附中实习一年，在这个期间，文革爆发。

文革开始，我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对学校的一些教育方针提出质疑。不料在红卫兵眼中，“革命”是他们的特权，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及他们的“狗崽子”投身革命，都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至少是“投机”。于是我变成了“投机分子”，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红卫兵的严酷打击，我迷惘不

解，却仍旧想在“革命”中洗刷自己。

大串联开始了，这时候我19岁。

尽管中央在当年的12月底就号召结束串联，复课闹革命，但是我还是在全国各地转了整整一年。下面串联见闻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写的，尽量保持我当时的观点和心境，也可能在括弧里做一些现在的评论。

## 农业学大寨

### 太原—阳泉—大寨

#### 去大寨

1966年十月，学校高三学生张铁军那派的红卫兵组织学生去大寨参观和劳动。去大寨是自愿报名，我们实习组的6位女老师都参加了。张铁军的红卫兵相对那些军干子弟的“红色恐怖”组织，稍微温和一些。尽管如此，我的处境在学生中仍是很不利的。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太向往外出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天，能够亲临实地参观，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尽管频受打击，我仍然不屈不挠地发自内心地要表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愿望和决心。

参观队伍庞大，师生共有二百多人，多是一些初中小孩，大约是爸妈不放心他们单独串联，就让他们跟了张铁军。我们从学校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脚之地，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才登上火车。

#### 山西的醋

在山西太原换车，第二天才有去阳泉的火车。一下火车，大家就涌进车站旁边的饭堂，诺大个餐馆，只卖一样东西——刀削面。五分钱一碗，光面。桌子上有酱油醋，随便加。都说山西醋好吃，拌在面里才知道，何止是好吃，醇香味美，而且并不很酸。就为了这醋，我又买了一碗刀削面。

剩下的时间去看市容，太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和被红海洋淹没的北京完全不同，整洁安静，平和有序，还没有被“革命”改造得面目全非。公共汽车上有小孩子用普通话给大家诵读毛主席语录，声音稚嫩，稍带口音，委婉动听。

## 阳泉梨

在阳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拜烈士陵园。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我去过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数次，去过八宝山烈士公墓，在广州我去过红花岗、黄花岗；在南京，我去过雨花台。我独自（实习小组的老师都没有兴趣去）站在阳泉烈士墓前，心潮澎湃，默诵着毛主席的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阳泉车站上有很多卖梨的，梨是未经嫁接的小酸梨。五分一斤，学生们都抢着买梨解渴。我用妈妈在广东阳江买的小刀削梨，阳江小刀真好使，又薄又锋利。我削水果的手法与妈妈相同，食指推刀背，从左往右，逆时针地转着削，削得飞快，这一辈子除了妈妈和三妹，我没见到第三人这样削水果。很多学生觉得新奇，递上来水果抢着让我削，以至排起了队，仿佛忘记了在校时对我的仇视，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仇视我什么。我削了一个又一个，自己都顾不上吃，暗中觉得好笑，就是一群孩子嘛，阶级斗争本来就是强加于他们的。

## 土炕

到了大寨。我们几个实习生住在大寨大队附近的武家坪大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的房间是他们用来存放杂物的，临时腾出来的。常年没人住，又冷又脏。头一天晚上女主人给烧了炕，热得我们像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的那些晚上，她就不再烧炕，十月底的天气睡在冰凉的大炕上，冻得没法入睡。最要命的是身上奇痒，不知是虱子跳蚤咬的，还是山风太硬，水土不服起的风疙瘩。从头到脚全身红斑，晚上数一数，竟有三百五十多个包。通宵就在咋吃咋吃地抓痒，不能合眼。夜里大家聊天，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北京洗个热水澡。老那——实习小组中我要好的朋友紧跟上：“我也是。”其他几个人没吭声，我马上后悔了，他们在想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假革命或口头革命派？他们会不会向红卫兵汇报？

## 派饭

我们在房东家里吃派饭。一天两顿，一人一碗糊糊，大约是荞麦面或什么东西。没有一丝油星，连盐味都没有。里面只有几根从菜园子里摘下来的干豆角，连皮煮的。皮已经又干又硬，我一边嚼一边犹豫，嚼不烂的渣滓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看看房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渣子也没有，只好学习劳动人民，把干豆皮强咽下去。糊糊的味道也很怪，最好吃的是放在糊糊上面的一小勺辣子，又咸又辣，提味。舍不得一口吃完，等辣味涌出来，吃掉辣子周围的糊糊，再等辣味涌出来。干了一天活，早已前胸贴后心，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饱肚子。这里只有男劳力才吃干粮，眼睁睁地看着男房东吃了两大海碗稀的（那碗的直径少说也有八寸），还啃着大饼，馋得不行，心里鼓励着自己，再坚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么，首先好好地填饱肚子。

### 在大寨劳动

在大寨主要是干活，活路很广，割豆子搬石头修公路掰玉米挑担子，干了近半个月。大寨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建设梯田著称的。不管什么活路都要沿着梯田上上下下。挑担上山是最累的活，有几天我们要把收获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场院。挑着两筐玉米（到了场院要过秤，最多的一次我挑了101斤），肩膀压得生痛，步子几乎抬不起来。几个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挑瘦削苗条，纤细的腰身一摆一摆的，轻轻巧巧地走着，几步就赶上了我们。仔细观察她们走路的窍门，发现她们走的是“猫步”。胯一摆，一只脚落在另一只脚的正前方，再一摆，后脚又落在前脚的正前方，走的是一条直线。我学着这样走路，真的省了好多气力。挑筐的姑娘们下山与我相遇，总要笑眯眯地问一句：“冷哩不冷？”“累哩不累？”是用山西醋浸泡出来的脆生生的嗓音，像唱歌一样，可以谱得出曲子。至今音犹在耳。

### 大寨苹果

除了干活，还和贾进才，武家坪民兵，贫协主席等开了座谈会，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展览会。学习着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学生们“与人奋斗”的筋又痒痒了。没有黑帮分子也要想办法找些阶级斗争的动向。

一天下了工，我和实习小组的人到大寨唯一的供销社转了一圈。大寨供销社

比一般农村的小铺要大一些，是新盖的，全村最好的砖瓦建筑物，想来是为了满足上大寨参观者的需要而建。商品不多，那年月我们也不会企望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和梨，苹果又大又红，梨子也特大，黄澄澄的，一看就是新鲜多汁的。老那说，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我先是犹豫了一下，因为一开始张铁军宣布的纪律里有一条说不许上供销社买吃的。实际上供销社里每天都挤满了娇生惯养的“红卫兵小将”，购买各种各样的食物。没人反对老那的建议，一人买了一个水果，反正“法不责众”。我犹豫再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我不知又要开什么会，只是带上白天的疲劳听上一耳朵。只听得红卫兵头头张铁军——我们认为他算是红卫兵里比较讲政策的一个——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投机分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自打文革开始，红卫兵们就根据我的体型（我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刘企鹅”，一经过校园，“刘企鹅”的喊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无地自容。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上纲上线：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到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亡！”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我心中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说是他们对己对人使用着双重标准，那是抬举他们。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的游戏而已，几天没“搞阶级斗争”，心里就痒痒得不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有胆量辩解和反抗，一条条黄铜扣的皮带包围着我，我知道他们打人是不要命的。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了。最让我难堪的是贫下中农也在场，因为我劳动卖力，他们本来对我印象很好，态度也非常友好，现在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怎么看待我？太丢脸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实习老师也都买了苹果和梨，一个个心安理得地坐在下面，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一切，何况我是被动的，最后一个买的。再看首倡者老那，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像个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一直是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的。

我心里想，是谁告的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 惩罚

张铁军宣布惩罚条令。惩罚的方式很奇怪，让我给学生送夜宵（瞧瞧，还要吃夜宵，一帮少爷小姐，又在玩弄着双重革命标准），以及每天吃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他们不吃派饭，自己做饭）挑三担水。想起今年三夏劳动时，因为对我有怀疑，就令我去厨房干活。后来有些学生拉肚子，就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我被抓了“现行”——迫害革命小将。为了证实一个人是反革命，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多么奇怪的逻辑。这次又是同样的伎俩。当晚，我有些发蒙，顺从了他们，由红卫兵皮带押解，把夜宵挑到红卫兵驻地。所谓的夜宵，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熬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粥，里面油盐酱醋味精都放上了，还放了大量的糖和葡萄干，还有许多他们在大寨商店买的好吃的。那东西做的又咸又甜，烂稀稀的，令人恶心。稀饭装在两大铁桶中，死沉沉，心中只求他们这次别胡吃海塞，跑肚窜稀。那些粥红卫兵也不爱吃，最后都倒掉喂了猪。

第二天红卫兵又来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脑子已经清醒起来：如果是为集体服务，挑几担水也没有什么，但作为惩罚我不能接受。几个月来我对红卫兵的理解宽容忍耐突然走到了尽头，爆发出反抗的怒火，我坚决拒绝道：“我不干了，我不挑水也不送饭！”红卫兵把水桶扁担扔在我面前说：“如果你不干，你就永远也别想吃饭。”有几个学生又想上来打人。我嘴里硬顶道：“我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挑水我只给贫下中农挑。”心想你们总不能在大寨这块革命“圣地”把我打死吧。拿贫下中农做挡箭牌，红卫兵居然拿我没办法。

随便找了一家贫农挑满了缸。挑罢水，我坐在门口土坡的石头上默默流泪。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来到这块英雄的地方，却要受这些人的气？为什么几个

月来我一直被打击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运动中去？我的高中同学在学校里几乎都是革命的闯将，可是我在运动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锻炼呢？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制。我开始明白，“革命”这个词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义。非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是没有权利“革命”的。如果这些人要“革命”，那么首先要问“革谁的命”，在红卫兵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要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我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几天，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

### 亮点

大寨留给我的记忆不堪回首，唯一的亮点来自一位女学生。她是八里庄农村的孩子（师院附中的学生来源主要两部分，一是附近军队大院，一是附近农村），大概是初三的学生，长得粗粗笨笨，可很会干农活。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上山割黄豆（从来看不见一个红卫兵干活），她割起豆子来很麻利，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副手套。豆子已经半干，豆荚尖扎手，豆秆上的毛刺弄得手又痛又痒。女孩给了我一只手套，教我怎么样割豆子。要使巧劲，镰刀贴着地皮，刀尖轻轻一划，豆秆就倒下了。

我们边割边聊天，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她絮絮叨叨地讲父母挣多少工分，姐姐嫁到哪个村子。她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娇骄二气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师，光是这一声老师就让我十分感动。她说一点也不喜欢班上的红卫兵，他们重视的只是父母当什么官，根本看不起农村子弟，她连红卫兵也加入不上，也不想加入，整天打打闹闹有什么意思。文化革命似乎与她无关。我心里隐约觉得她觉悟很低，到那时我还是够“左”的，自己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还发自内心地认为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我没对她说什么。和她在一起，大半年来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那么轻松，那么有人味。

干着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整个山头就我们两个人，不怕蹲在地边解决问题。我们边聊边拉，拉一节，挪一步，突然想起身上没有手纸，她从兜里翻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我。“你呢？”我问。“没关系，我不用。”回手从身旁摘下两张蓖麻叶子，抹了两下，“我们农村都这么擦。”如果说拉屎让我的心

与她更贴近，这话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许她根本无所谓，但这是我在大寨，或者更久以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回北京了

终于熬到了回北京的时候了，那些红卫兵更是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全国性的大串连已经进入高潮，从阳泉到北京的火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人挨人地站着，十一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终于在黎明时分挨到了北京。■

【述 往】

## 插队的那些事（八）

### ——雨村的日子

朱 特

我是一个农民。从小就生活在冀中老家，到了7岁祖父把我带到京城准备上学，只因我的生日差俩月不足7岁，人家小学说什么也不要，让我再等一年。我赶上人口爆炸的年月，正当要读书的时候却是孩子多学校少，只好严格控制入学年龄。祖父又把我领回老家，在家乡又上了一年的乡村小学。

那一年正好赶上大跃进，公社社员们战天斗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做着超英赶美的伟大事业。那也是全民发癔症的时候。别的没有记住，只记住了全村人都吃食堂，送饭到地头。7岁多的我也跟着大人下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主要是为了有口吃的。

就像诗书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受着书卷气的熏陶，我从小就在勤俭持家的祖父母影响下干着力所能及的农活。上了学每年寒暑假都被父亲打发回老家——那也是我开心的时候。祖父就让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每天还记3分工，上了中学

涨到5分。我极乐意到生产队里干活，因为和我同龄的孩子这时都在队里干活，到了地里热闹。这样说来，我应该是农业地的“科班”出身。我熟悉农村里的一切。

刚到雨村时间不长，二饼子见我做农活像个样子，曾说过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其实我不仅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他只看到了外在的我，到小营子没多久一个老农就说我：你和他们（指别的知青）不一样，你和我们一样，是个庄户人。他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骨子里。

我到了雨村，和那些没有农村生活的知青感受不大一样，可以说我几乎没有适应期，来了，就像回到了老家（那些没有农村生活的同插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唯有他们自知）。我甚至觉得雨村比我的家乡生活还好。雨村唯一的不好是没有厕所，每有内急都要出村老远到地里去解决问题。那时做梦的内容经常是到处找厕所。多少年以后，我突然醒悟到，雨村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我的工龄就是从到雨村开始算起的。

在小营子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后，我们告别房东九和搬到了大营子，从此成为雨村第二生产小队的社员。我们是春天搬过来的，由于知青的盖房款和木料指标没有下来，知青仍然当房客。男生借住在二队的一位老乡家的耳房，女生成为小队长怀怀家的房客。一直到这年的夏天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宿舍。

这是坐北朝南一排5小间的知青宿舍。从西边数第一间是二饼子与力兄的房间，挨着的是我、三哥和包四兄的住处，接下来的两间是女生的宿舍，最东边的是厨房兼库房。紧挨着的东邻就是队长怀怀的家，最西边则是我们的土豆窖。在雨村西南头还有和这一模一样的房子，那是雨村另外10个知青的宿舍，他们的厨房设在了当中的那间，这样的安排好像比我们这里更合理些。一门一窗一炕与当地民居截然不同的小房间，是按知青的要求盖的。我们这排房子里住着9个知青，5男4女，另一位女同学在我们入住知青宿舍前就有了小营子的“绿卡”，永久居住在小营子了。

我们入住新房时曾雄心勃勃地要打造成一个小院：垒起院墙。东边的邻居是怀怀家，有一道矮矮的土墙头算是和我们有了分界，南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我们的房间向着路人敞开着，西边没有邻居，是一块空闲地。如果有了院墙，知青们就可以躲进小院成一统，真像是过日子的庄稼人了。多好啊。

于是，我就利用值班做饭的空闲时间在西边闲地上挖了一口取水井，雨村的地表水很浅，挖地一米多深就有水渗出，但不能饮用。每天收工后，大家就取水和泥（土也从西边的闲地中取）打造雨村人称为“泥木珠子”的大土坯。土坯晒干后再垒成墙头，这是很苦重的营生。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就已经很累了，再加班加点地干这么重的泥水活的确是很辛苦，时间一长难免受不了。

恰巧这时西边闲地的主人找上门来，说那是他家的宅基地动不得水土。哎呀！我心说不好。自己还是个“农村通”呢，农家的宅基地那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不经过人家的同意（不可能同意的）就在宅基地上挖井取土，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人家看在我们是知青且又四六不懂才没有让我恢复原状，实在是宽大为怀。工程就此打住，那已经垒成的几米长的一段矮矮的土墙就成了我们雄心勃勃的“纪念碑”。天热时节，晚饭之后哥几个常坐在上面侃侃大山。

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踏实了，如同有了自己的家，把日子过好是我们的“基本路线”。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们面对着现实别无选择，只能适应环境，努力提高生活技能，雨村人怎样生活，知青们也就怎样生活。在那个人如草芥的时代，风把你刮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一年多的时间下来，我们适应了从春种到秋收的种种农活，其中的苦与累对敢于面对的年轻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毫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农活是个人就会，只要你肯出力。我们真正成了农民，商品粮和知青们告别，我们不用再赶着小驴车从40多里外察素齐的粮站买粮了，而和雨村人一样，从打完场的场院里把最新鲜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背到“家里”，这是雨村的土地给予的最为宝贵的馈赠。善良的雨村人严格执行了国家对知青的口粮政策，缺粮的日子再也没有过。秋天，每次小队里分油，知青户的人总是能在事先得到消息而排在最前面分到最少杂质的食用油。这是因为女生和队长媳妇怀嫂的关系不一般，每次分油前小队的“机密”女生总能提前知道。

回想起雨村的日常生活，就会常常想起队长喊工的声音：动弹的走了哎——这个声音如同霹雳在耳边响起，把沉在梦乡中的我震醒，此时，微明的晨曦才从窗外泄漏进来。同时睁开眼睛的一定还有同一条炕上的三哥和包四。这便是一天的开始。

雨村人把下地劳动叫做“动弹”。作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你可以可不去动弹，

可以犯懒，但你就此会被人看不起，你就会失去尊严。知青们用自己的能力得到小村人的认可，他们也对得起小村人给的最高工酬。

前三年，知青是作为单纯劳动力使用的。三年后，雨村人看到了知青的价值是教他们的后代学习文化，于是，只要是愿意的知青都当了孩子王。而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受知青开蒙而成就的。

在远离家乡的内蒙古高原小村，知青们成了从土里刨食以工分为生活来源的农民，但他们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雨村人，终究没有成为雨村的一员。雨村人也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当成了过路人，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人。知青是雨村里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特殊群体的最后消失，证明了那个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的破产。■

【述 往】

## 安希孟回忆录（七）

### ——乱世读书

安希孟

我们得感恩刘宝英老师在战马倥偬岁月里复课闹革命，为我们上英语课（内容不外英文的两报一刊社论老三篇）。我和拙荆至今还能背诵《为人民服务》中“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可是不争气的我，却没好好学习，而是醉心于党同伐异乱党政治暴民运动。我还写大字报提倡取消中小学英语课，真乃昏头昏脑愚昧得可以。我后来研究英汉对比，赞美拼音文字，斥责象形文字之非。我也有些内疚，因为文革的关系，在文革中，有时候我们和杨芝岭老师刘宝英老师陈达星老师竟然形同陌路——因为忌讳谈论文革派别敏感话题。

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单行本，我几乎每册必买。文革小报传单首长讲话，我攒了一纸箱，毕业时精简后装订两册，但80年亦遗弃。北师大非法印制的未发

表的毛主席文集八册，在全国应是最齐备的。这当然没有被控告侵权索取版税。有一次开会，我活学活说，“现在十点，开会”。大家哄笑，因为这话是毛主席主持中央会议说的。工宣队进驻落实政策（实为解放干部）开会发言稿，常是我写让董、孔代表二班去念。蔡文莹老师毛笔字好，也常常抄写大字报。我也很爱显派自己。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当然是念给耿志国听的。

文革后期，有些书店书籍解禁，70年代初北京东安市场处理旧书，西四书店内部发行学术书籍，我都徜徉其中。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地。女孩子逛服装店，男孩子逛书店，自古如此。文革中张韵斐老师卖废品，我看到一本英语语法书，就要了下来。1971年陈垣校长去世，图书馆一大堆他的书，都是挑剩下的。我想淘金，结果看到国民党一位旧军长写的乌托邦论著让他指导。从书堆里的确没有找到其他有价值的书。毕业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书呆（袋）子。不少书引起的我的学术火焰——当然我未必一定对所有的领域或专业感兴趣。混乱时也丢了不少书。都是邻舍顺手牵羊，我也忘记亡羊补牢。

我常说“英语26个字母我只学了24个，文革就开始了”。我从来不避讳说自己是69届大学生。我也不回避自己在文革中还算积极——就因为这，同学同事佩服我说，人家巴不得撇清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大学毕业，大家的鉴定写的都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只有我没有这一句。我找到都祖尧书记，他反问我：“你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是干什么”，好像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我问，你说我干什么。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自传，我写的是：以理性态度积极参与文化革命。大家觉得我的自传朴实自然得体。四人帮倒台，我是彻底否定文革派中人。

文革把大家都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九届二中全会批判陈伯达，毛泽东号召读几本书，我们于是有机会阅读马克思的书籍。说实话，我们如堕五里雾中，似懂非懂，不懂装懂，也没有认真请教政教系的老师。囫囵吞枣，南郭先生，离题万里，不止我一个人。不过毕竟对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著作有了些许了解和体认。我得感谢当时那个政治氛围，还算不荒废时日，北师大出的马列几本小册子参考书，陪伴我度过知识饥渴的岁月。“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时不敢多想，现在就倍受鼓舞。贫穷的社会主义，如果仔细阅读，也会有所了悟。“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这个词是那个时候学到的。但是现如今知道，康德的先验哲学，可一点儿也不是崇奉少数天才异

禀之人。后来为了深造而报考文科或哲学研究生，就与这段知识有关。1978年第一次考研考的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起来就不觉得吃力。

有利于提升我们的知识修养的，还有经常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样板戏。样板戏的剧本和剧照公开出版后，我购买了所有的书籍。报上样板戏评论和溢美之词，我都窃为己有，剪辑成册，红蓝铅笔画满道道。记住了许多美轮美奂的辞藻，也学了一点“三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972年工宣队罚我到后勤处劳动，在后勤处修理桌椅板凳。到“作战部”搬桌椅，忽有惊人发现：文件柜上竟堆放尘封网埋备受冷落无人问津的旧书。这是不知何时查抄的政教系师生的宝物，其中有苏联敦尼克的《哲学史》。晚上我拿手中的钥匙偷回了几本看也看不懂的书——看不懂的书肯定是好书。看得懂的书干嘛要看？我被工宣队罚上了学术的十字架，承担了西西弗斯的苦役。在后勤处劳动遂成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于是感同身受地领会了司马氏“仲尼厄而作春秋”。自己仿佛就是屈子。劳改期间，认识地理系东北籍顾姓同学。他知识面广，给我借来印制精美的仿佛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天文地理科普彩图书。受其启发，我后来阅读了科学史书籍，遂对科技史略有涉猎。后来阅读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就有了基础和兴致，颇觉得游刃有余。后来我竟拿到科学与宗教的国家社科项目。

我到银川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就主要参考敦尼克书。作战部查抄之书中亦有一册《外交史》，此书未引起我的兴趣。后来世界历史知识储备足够后，方知国际关系外交邦谊谈判媾和国际条约始于欧洲。马基雅维利这美丽的名字，也是后来知道的。可惜此书已不知鹿失谁手。一本《墨索里尼传》，也未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吴振明告诉我说我有这本书。1971年有一次在文史楼108开会，黑板上有“叔本华”（Schopenhauer）仨字，板书极工整，就在我心中激起涟漪。那一定是政教系某老师批林彪“唯意志论”。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叔本华也没关系呀。况且意志主义也不是恣意妄行胡作非为为我行我素，乃警醒世人艰苦卓绝发扬蹈厉！大锅饭土高炉一平二调乱刮共产风，分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氏族部落特有。我的藏书至今有高年级不知谁氏的王力《古代汉语》。这也是始终陪伴我的案头必备书。“修辞立其诚”。我一直醉心于文章语言华美畅达典雅端庄，与这些书都有关系。

一个健忘的民族没有出息，失忆，不去回顾，就没有前瞻。我研究希望哲学，写过文章，今忽然间生发感念：何不论述“记忆”的重要性呢。我们不是提倡忆苦思甜和撰写回忆录吗？不忆苦，怎能思甜？失忆，很痛苦。因此要拾遗。没有回顾，就没有前瞻。为了前瞻和希冀、期盼，吾人应该学会记忆。追溯，溯及既往，缅怀先圣，才能奋然前行。不要忘却。健忘症，是可怕的病症。为了忘却的记忆，说的是为了不要忘却而记忆。我们振臂，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这是痛楚的记忆。痛楚的记忆比起荣华富贵，更有意义。但我们不是为着复仇，而是消弭一切产生怨怼仇恨晦气杀戮阴霾戾气的根源。我们相信恶性循环会由于天下大同万国联盟人类一家而消亡殆尽。一个依靠武力夺得的权力同过去实行完全的决裂，是暴殄天物的政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信就是信实、诚实、的确据。离开回忆，希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花之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希望就无所附丽。

思想是自由翱翔的。你必须自由，你就是自由的，你不能不自由，你命定、注定、被派定是自由的，你被摊派、被决定是自由的。这就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统一。在“你是自由的”这件事上，你是不自由的：由不得你。你必须自由，被迫自由。这是自由的悖论。有一种理论认为人应该服从自然法则，方能自由，这种理论认为人应该服从自然必然性。但除了本能，人还有超越自我的一面，人能控制自己。人是自己的主人。人是要超越自我的——自我本我和超我 superego。人有所追求。但不是驯服工具。■

【简讯】

##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征稿启事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

【特刊征稿】

文革 50 周年：回顾与展望

特邀编辑

董国强（南京大学）、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

截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

近 50 年前的 1966 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其中，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巨大损失，国家政治发展的倒退，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如果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国家错误，一定会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文革的恶劣影响根深蒂固，至今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文革式的思维、政策、以及治理方式。不过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十年文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素材。尽管多年来由于一些人为的限制因素，许多学者视文革研究为畏途，许多重要课题和大量历史资料尚未得到有深度的研

究，但依然有人在此领域默默耕耘，不断推动文革研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50年来，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且随着时间的积淀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现在回头看十年文革，应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更全面，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更客观、更公允。有鉴于此，《当代中国研究》筹划在文革50周年的2016年出版一期关于文革的专辑。我们特别欢迎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有广度的综合分析，以及有理论建树的文章。

题目和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 对文革概念的理解及其阶段划分研究
2. 对文革复杂动因的深入研究
3. 文革期间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模式研究
4. 文革期间群众运动特点研究
5. 文革期间大众社会心理研究
6. 文革期间重大事件个案研究
7. 文革时期不同类型代表人物研究
8. 文革时期日常生活研究
9. 文革运动国际影响研究
10. 中国文革与其他共产国家政治运动的比较研究

我们欢迎中文或英文写成的论文。论文一般不应超过8000字（包括注解在内）。作者应参照《当代中国研究》的网站（[www.modernchinastudies.org](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有关论文格式的指示。请把论文电邮给

董国强: [dongguoqiang\\_1962@126.com](mailto:dongguoqiang_1962@126.com), 或

王元: [ywang@pm.tbgu.ac.jp](mailto:ywang@pm.tbgu.ac.jp) ■

【简讯】

## 复旦大学召开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

梁幼志

2015年1月9—10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海外中国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共同举办了“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学术研讨会。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3月，其旨在依托复旦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国季刊》于1960年3月创刊，编辑部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其历任编辑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所发表的高质量、权威性的学术论文，使读者可以从历史、学术等方面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心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副教授蓝梦林(Patricia Thornton)与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共同发起，海内外十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原拟由马若德（Rod Macfarquhar，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以《过去和未来的悲剧》一文开题，因其身体的原因，未能如愿。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学术活动”一栏中，对此次会议有详细的报道，兹略加修改，转载如下：

首先，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冯克（Frank Dikotter）教授以《静悄悄的革命，1971—1977》（*The Silent Revolution*）为题，报告了自己利用广东档案材料，研究城郊居民文革时期的经济活动及其与1971年林彪案件后的关系。之后，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报告了《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从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及“大民主”，到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乱，毛泽东晚年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是非得失，认为“秦政法”更容易达到“公天下”和天下大治的目标。

第二场报告中，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报告了《升温与降温：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他从个人崇拜与党崇拜、作为毛泽东领导和控制文革手段的个人崇拜以及个人崇拜如何被他人作为工具三个方面，指出了个人崇拜的工具性应用。蓝梦林博士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践》（*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RC history*）。她以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为线索，指出这一连串的政治变革的核心企图，是将大众纳入官方建立的现代化语境。

9日下午，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以《“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为主题，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作用与功能。清华

大学作为文革时期的典型代表和始作俑者，具有辐射全局的作用和无出其右的影响，其文革实践与经验有独特的意义。之后，是南京大学董国强教授的报告：《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江苏徐州个案研究》。董教授依据自己收集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文字和口述历史资料，系统概述“三年三个徐革会”的具体情况，深入探讨军队在文革中的角色和作用。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做了题为《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报告。金教授以写作组中的“罗思鼎”成员为主，在梳理文革“三起三落”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剖析写作组功能变化和权限扩展的原因，探讨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运作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来自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以《另类人生——刘福禄的反革命案》为题，从吉林省海龙县黑山头公社和平二队的小学教员刘福禄的革命案件入手，透视“文革”中底层民众的政治生态，揭示政治案件的发生机理和公安机关的处理程序等。

10日上午，英国国王学院的裴开瑞(Chris Berry)报告了《为什么铭记文革时期上海电影？毛时代遗产的学术研究》(Why Remember Movie-going in Cultural Revolution Shanghai? Academic Work as Legacy of the Mao Era)。他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穿着、日常生活与电影之间的联系。之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博士的报告《衣领上的革命：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抗争》，关注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对民众日常着装的影响，民众有意无意的反抗、介乎反抗与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着装行为，以及着装反抗的策略在动机、阶层、性别和地域层面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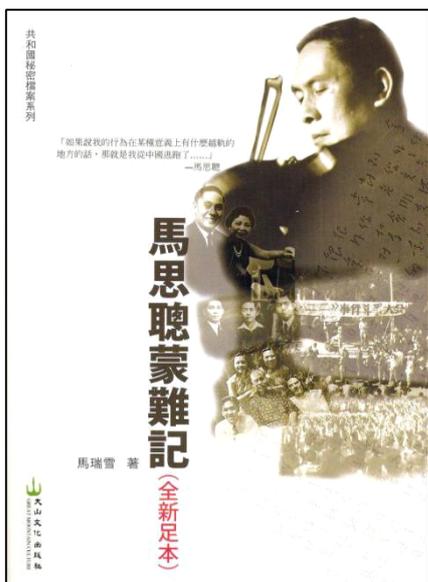
第二场讨论中，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魏简(Sebastian Veg)博士报告了《毛时代的文学描述：超越伤痕文学》(Literary Accounts of the Mao Era: moving beyond scar literature)，分析自卢新华开始的伤痕文学以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对文革进行反思的重要作用。之后，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研究员报告了《文革在校生的知识构成》，研究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和知识构成。

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的主持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吴迪教授以《“红色话语”中的致敬体——文革语言初探》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红色话语”包括词汇、修辞、语体、风格四方面，其中的语体分为文评体、政论体、

揭露体、检讨交待体和致敬体五种。吴迪教授探讨了致敬体的属性和特征，它的形成过程，在使用语言（实词和虚词）上的特点和使用反复、排比、比喻、夸张、引用等修辞格的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风格。之后，山西社科院的丁东研究员从史学评论的角度，报告了《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选择了影响较大的五种语境，即毛泽东语境、邓小平语境、落马高官语境、造反派语境、局外人语境等，

分别予以评述。

会议在总结讨论中达到高潮。与会学者们表示，愿为未曾亲身经历过文革的青年研究者铺路。金大陆教授说，他与金光耀教授受上海知青协会的委托，作为志愿者编纂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资料辑》，正是希望留下丰富的研究资料。许多学者表示，自己投身于此领域研究的初衷，不仅出于学术兴趣与追求，更出于使命感与责任。大家希望能借助于工作坊，日后展开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 【简讯】

### 《马思聪蒙难记》在香港出版

谢静文

2014年12月，香港大山出版社推出《马思聪蒙难记》一书。作者是马思聪的次女马瑞雪。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马瑞雪在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在文革风暴初起之时，马思聪被红卫兵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吸血鬼”、“牛鬼蛇神”而遭到野蛮的批斗的情形。如实地描写了在家被抄，家人被监视的情况下，她与母亲、弟弟如何逃离北京，到南京、上海、广州的亲友家避难；她潜回北京营救父亲，最后与母亲王慕理、弟弟马如龙在广州会合，一家四口从广州乘船偷渡至香港，又通过美国使馆逃往费城的经过。

此书成稿于马思聪获得平反昭雪的八十年代，1987年，江西《百花洲》以

《劫难》为题刊出。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马思聪蒙难记》为名，将其结集出版。2013年5月12日是马思聪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再版此书，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果。

这次出版，书后有四个附录：

附录一是马思聪的答记者问：《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附录二是马瑞雪写的马思聪流亡美国的生活，马思聪的女婿古承凯追忆马思聪和妻子马瑞雪的文章，以及马瑞雪的女儿怀念母亲的文章。

附录三收入了两篇文章，一是前三联出版社编辑文静写的追忆马家的故事，二是NANCY口述，金毓镇整理的马思聪逃亡香港的口述。

附录四是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王培元写的《〈马思聪蒙难记〉重版流产记》。■

【资料】

##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

### ——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六）

#### 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

##### 甲. 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

六〇年夏天还在云山时，就听到指导员在传达报告中用过“半修正主义”一词，当时颇觉新鲜。后来在“小广播”中得知，这就是指的赫鲁晓夫。同时又听说：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与《静静的顿河》正在我们内部被批判。这才使有所悟：怪不得在我们的报纸上不再转载《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论文了，有关苏联的消息减少了，地位也不显著了。再回味一下我们刊登过的赫鲁晓夫的一些谈话，觉得其中确实有问题，比如在西藏事件之后，他在回答印度《闪电》周刊的记者问时就这样说过：匈牙利事件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这种说法与我们党的观点是相冲突的。又一次，有一个西方的记者问他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

位记者认为，这篇社论中谈到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是有矛盾的。赫鲁晓夫说，他还没有看到这篇论文，他确信中苏不会有分歧。这显然是托词掩饰。这一切表明，我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分歧，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表面化了。

我们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与兄弟党，为什么竟会产生分歧呢？我深感不解。自从反斯大林个人迷信之后，我对赫鲁晓夫当时的一些做法是比较喜爱的。我觉得他比较开明、灵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发缺点，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及国防威力发展得很快，对入侵的敌机采取了断然抗击的态度，而对自己的人民是喜笑颜开的，他能和改造好了的小偷在一起照相，对《不仅仅为了面包》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同志式的态度。我认为他比我们的领导人更民主，更仁慈些。我过去想到苏联去，也正是因为在那里“可能会”心情舒畅些。

当然，我没有赞同他的一切作为。当宣布莫洛托夫等同志为“反党集团”时，我是鸣不平的。那时我还在外交学院做党支部书记，<sup>2</sup>因而我的这种认识与我个人得失毫无关系。我们的党中央对这一决定表示完全同意，我也是反对的。我觉得即使这些老同志的思想已经“僵化”，即使他们在路线上有了错误，也绝不是企图断送党的事业。对有分歧意见的同志，动不动就按上一个“反党”的帽子，实会令人毛骨悚然，何况这些人还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战友。就拿斯大林来说，尽管他有三分‘罪过“，杀错了许多同志，如果因此就说他是居心“反党”和“破坏”革命事业，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尽管如此，在权衡其优劣之后，我仍然认为赫鲁晓夫的好处是主要的。

回到北京后，尤其在苏共 22 大之后，我才摸清了问题的底细而恍然大悟。过去的宣传只是一个方面，是表面性的，次要的；而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另一面，是本质的，主要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对敌人，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对自己的弟兄，反而是狂大无忌，气势逼人。我觉得，由于观点上的偏差和水平上的局限性而酿成路线与策略上的错误，尚可通过同志式的协商与讨论而给予纠正；而赫鲁晓夫的许多蛮横的作为则是属于道德品质范畴之内的，是不可予以谅解或轻恕的。我们的国家到了如此窘困的地步，他不是给予更多的援助，反而断绝了援助，撤走了专家，强迫我们更加勒紧裤带而继续输出农产品，这无

<sup>2</sup> 戴煌当时是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学员进修班的党支部书记——编者注。

异于前面点火，后面拆桥，叫我们腹背受击，进退两难。即使分歧的责任完全在我们这方面，那也只是理论上的问题与方法政策上的问题，只能通过研究探讨来解决，而不应该摆出一副大国君主的姿态，一怒之下而不顾大局。这还谈得上什么国际主义？！对于最小的兄弟阿尔巴尼亚，比对美帝国主义还要憎恨百倍。这简直与《左传》中的郑庄公之惨害其胞弟共叔段的“不义不暱”之为可相比拟。在赫鲁晓夫的脑瓜子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词已经不翼而逝了。

把斯大林同志骂成一个暴君和专贪私利的人物，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把他的遗体从陵墓中排挤出去则更是“野蛮”之至，令人极端愤慨！在近代史中，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内，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中世纪式的不文明的罪行。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在十五年以前，蒋介石匪徒打到鲁南以后，把我们的罗炳辉同志的遗骨抛于墓外。从此以后，除了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之外，再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暴行了。

最近爱伦堡发表了一部回忆录，把斯大林同志描绘成“向自己的党和人民挥舞长剑的暴君”，这是歪曲与污蔑。试问：这些“有识之士”当时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婉谏明责，制止其“暴行”？爱伦堡应该不会忘记：斯大林还有更好的一面，他自己在廿年前的一篇叙述中，就生动地描写过斯大林是如何帮助他和关怀他创作《巴黎的陷落》的：一天夜间，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大为震怒，责问对方是谁。耳机中是一位老人的缓慢而温静的声音，“伊里奇，你干嘛这样生气啊？我是斯大林，是不是我打破了你的好梦或打断了你的构思？我告诉你，你的《巴黎的陷落》的第一部我一口气读完了，写得很好，我很兴奋，很关心那个工人和女青年的命运。你打算怎样安排他们的结局啊？你需要什么帮助，需要什么资料，例如纳粹匪徒与西班牙内战的材料？……”当时的爱伦堡是被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可见斯大林并没有一贯乱舞他的“长剑”，要杀光所有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在犯错误的同时，对很多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事业是关切得无微不至的。然而今天，才智俱健的爱伦堡突然“糊涂”起来了，把斯大林的一切好处都给“忘”掉了。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不敢肯定它是否完全正确。也许命运注定我要在漫长的悲剧中消磨自己的一生。当人们指出斯大林的若干错误时，我同意，我拥护，于是我就成了“反斯大林分子”和“可耻的叛逆”；而今天，当人们要彻底

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又为斯大林和历史抱不平了，我又变成“斯大林分子”和“顽固的保守派”了。如果我在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也好，在“赫鲁晓夫时代”也好，可能都要死于非命。虽然我是据实而语，并自认为是真理。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也是这样。毛主席是万能，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如果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会坚决反对。

现在，赫鲁晓夫的为人被全世界看得更清楚了。他和美国的政客、富翁们一样，把自己的家族全部引进了政治领域的最高层。他的亲族均可加官封爵，均可轻易地获得美誉厚禄，还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去游说全世界。这种“共产主义者”是我做梦想不到的。就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之反对斯大林，用意何在。这和一般同志对斯大林的三分错误表示不满是截然两样的。如果说，苏共20大“害”了我，使我在三岔路口犹疑迷惘；那末，苏共22大又“救”了我，使我终于又认清了前进的道路。我相信，总有一天，伟大的苏联人民会排除掉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突飞猛进。

## 乙. 关于国内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在多方面都遇到了重大的困难，这也是有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转达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人，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

难起了巨大的功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识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或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即使）其中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蔽目不视。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全国的人心为之统一。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的话。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底，是坏是好，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金（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

此浪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于是“敌人”。<sup>3</sup>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此无不触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只能吃饭、喊“万岁”和谈情说爱。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讨论、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不准异议；领导上要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蔽，循环不已。尽管你发现，某一项措施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你不

<sup>3</sup> 我记得当时《红旗》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

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老老实实在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皆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和机械的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退和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的更多更坏。现在我们可以到处听到儿童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的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的怨艾；还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带小金表。问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特殊化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也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敌对分子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未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地唱过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高呼万岁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是反动的童谣也普遍地流传开了。更严重的是，大人对此不闻不问。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躬自咎。

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因此而无声息地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去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语不及衷。我们这样的机关，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如此，在其它部门，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不多了如指掌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数次发言中，均指出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和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危险，也只能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命运造成更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

“不成功，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凡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

为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许多人在会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半真半假——而且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太快、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而不能在过去的几年中就说它是“应运而生”。还有人说，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中关于错误的原因总结得不够全面和不够深刻，主要的却被漏掉，或强调不够……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兴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就对，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心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据我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它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也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时，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知其所以云。新华社如此，其它地方也好不了。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了，党和领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也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就以总理的报告来说，在承认错误、追查原因是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没放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或私生活上的小事，而是有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一旦承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请不要误会，我这是对总理个人有意见。不是，绝对不是。从我知道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以后，知道对党和领袖有许多错误意见时为止，以致直到现在为止，我对他一直是尊敬与爱戴的。我说的是其他人，那些应对重大的错误直接负责的人。不论形式如何，必须搞清楚问题，总结出确确实实的教训，给全国上下以借鉴。这就需要孔夫子说

的那种“过则勿惮改”、“改之为贵”的精神。要做过（到）这一点，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下”，发动全国上下，“亲攻吾之缺（阙）”。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们才能打消一切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与他们于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竞业勤俭，名短于人，躬求举世补己之不足。他们绝不恃其强而讳其疾，也绝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所以他们能巧积群智，深得人心，无往而不利，无业不能成。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就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德一度受到破坏或损害。而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正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确是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形势已经好转，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将团结得更紧，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必将会很快到来。

### 丙. 关于“反右”运动

毫无疑问，“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适时的。问题是：其范围过分地扩大化了。根据我们社内的情况以及在北大荒的耳闻目睹来分析：右派分子汇总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发展的道路和当时讲话的用心都是有同有异的。其中有老奸巨猾的官僚、政客、军阀，有被剥夺了财产权势的遗老遗少，也有汉奸、特务或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对党和革命事业确实有刻骨之恨，无时无刻不在阴谋向党进攻，妄图死灰复燃。然而其表现，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腹剑口蜜者有之，神形俱恶者有之，扬言“杀共产党”者有之，招兵买马、与党对抗者有之。对这些名副其实的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给以歼灭性的打击，揭露其真面目于全国人民的面前，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这的确又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又多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可是，也还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与党敌对的依据。他们所

以也对党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有些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毛病严重而对党的某些方面有所不满，有的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的余毒尚未洗刷干净而狂发谬论，有的是深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对新的生活方式还不太习惯，有的是愚昧幼稚而人云亦云，甚或还有人确实具有励精图治的好心，但因水平有限、涵养不深，思察欠周密，观点有偏误，再加上性格上的弱点，以致在发言时语恶色厉，令人怏怏悒悒者。从理论上说，这些人也是立场不稳，思想模糊。对他们也进行严肃地批判斗争，不仅挽救了他们自己，同时也教育了别人。这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以设想：如果在五七年不来个“反右”运动，斗垮了一些人，批判了一些人，教育了更多的人，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那末，在这几年的艰难困苦中，要像全国各地基本上平静无事而不出现程度不同的匈牙利事件，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把后一种人也列入反动派，称作“美蒋集团的代理人”施以大棒政策，就不免太过分了。而且，从某些方面说，对这种人比对那些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和那些可以把他们的全身泡在人民的血泊的战争罪犯，惩办得更加严厉，这不能说是“打是疼，骂是爱”、“对爱子尤须严”吧？在北大荒，我看到了许多十八九岁和刚刚二十出头的孩子，他们的罪名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他们的思想言态来看，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政治。其中有些人在犯错误的时候，也许还没有资格走向庄严地红票箱投入光荣的一票。照通常的法律规定，他们即使犯下了一般的罪过，也会因其不足法定年龄而免刑或从宽发落，更甬说愚昧无知的片言一语了。

当我们讨论“大家为什么不敢讲话”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的。他们认为：建国以来，我们发动过很多次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是敌是我均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例如：在“土改”中，绝不会把下无立锥之地的贫雇农或自耕自足的中农当作地主；在“镇反”与“肃反”中，也不会把历史清白或虽有问，而已主动交代过的人当作反革命；在“三反”、“五反”中，也不可能把两袖清风的人当作老虎，或者把微有污迹的人当作大老虎。因之，每经过一次运动，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要发生一次更加深刻的变化，人人心情舒畅，事事欣欣向荣。唯独“反右”之后，情况截然不同。因为真假右派分子的基本特点都是说话。而说话之有罪与否或罪大罪小，自古以来都是难以清断的。它可以轻似鸿毛，也可重如泰山，这全凭因时因地因人而定，没有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令人诚服的界限。这说明：在划定这一条界限时，不可避免地

要发生错误；既然如此，大家也只好守口如瓶，免得玉石俱焚。

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在探讨民主传统被破坏，大家不敢讲话的原因时，此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有着这样伟大的党和有着这样多的久经考验的成熟练达的领袖，本是可以避免这种副作用的，可惜我们未能避免。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精神，以致优劣不论，敌我不分。

写道这里，我不由地想到伟大的列宁的虚怀若谷的品德和洞察事物的精确与敏锐。在《难忘的一九一八年》，高尔基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彼得堡，饥饿、疾病、落后、公认的蛮横和知识分子的愤怨把他搞糊涂了。他向列宁写了很多信。这些信，我没有读过；但是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卅一日给他的回信中，也可以看出：高尔基当时的思想情绪是相当恶劣的和相当危险的。请看列宁在回信中写了些什么：

“你从痢疾和霍乱说起，立刻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愤：‘博爱、平等’。说来无意，而结果却有些像这样的意思：被围城市的匮乏、贫穷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其次是发出……攻击‘低级’文学……的怨恨的刻毒话。而结论似乎是‘残存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说，他们被‘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

“……难道是加里宁有把工人出卖给农夫的罪吗？”

“似乎‘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着一种近似同情的盛情’，而‘大多数工人’则是制造僭越‘共产党员’的坏蛋云云！你甚至发挥为‘结论’：革命不能让坏蛋来搞……”

“生活使你厌恶了，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加深了’……”

我们读完了列宁对高尔基的这些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再对照一下我们这几年来风行一时的习俗，不免要为高尔基担忧：恐怕他受不了一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至少将被送去“劳动教养”。可是，列宁完全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些话出自于没落的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口，我想，列宁一定会毫不留情；但这些话是高尔基说的，是自己的挚友说的，他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他深知，高尔基为什么会这样。他说：

“彼得城是近年来最不健康的一个地方。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的居民所

遭受的灾难比任何城市都多，工人所献出自己的精华也比任何城市都多，饥馑很严重，军事危险也很严重。你的神经显然受不了了。这是并不奇怪的。告诉你应该换一个地方，你却固执己见。……把自己的神经搅扰到有病的状态是完全不智的，……更不用说其他观点了。”

“……你在信里所提起的就是这些残余分子。他们的情绪不健康地影响着你。”

列宁并且指出，高尔基缺乏“特别广泛的政治见闻”和“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不解在那种地位上“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中的新事物”，因而“资产阶级的庞大首都的腐烂印象又在折磨着他”。列宁劝告高尔基要换一个环境。他说：

“我不想用劝告来勉强人，但是我不能不说：你要根本改变环境，改变环绕你的人，改变居住的地方，改变工作，否则生活会使你完全厌恶了的。”

所以最后，列宁不是骂高尔基是“叛徒”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把他一脚踢开或一棍子打死；而是称“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梅奇”和“紧紧地握手”。

七年前，当我谈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以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观点来理解它的；今天再仔细地阅读几遍，才发觉它的意义远非如此。这里用不着谁再来评论这封信的寓意深邃和歌颂列宁之伟大，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是多么地可贵。不能说列宁的这种精神是“右倾”的，“立场不稳”的。这是很值得我们的一些决策人学习的。这倒不是要把自己比作高尔基，而是说，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所犯的错误，从形式到内容以至于原因，和高尔基当时的错误情绪确实是大同小异。那么，党对这些同志所采取的手段似乎有点过分了。革命的道义不应该被转化为策略手段与权宜之计。它应该永远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能视不同对象的天分之高低与身份之贵贱而有所异。

我们许多同志在向党提出意见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对党的领导人的某些方面的不满而全部否定了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的特权之风与国民党时代的老爷们的秉性相仿佛，就把他们混为一谈，敌我不分。因此，我们所“攻击”的也仅仅是自认为与党的利益不相符合的那一部分——虽然这当中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而不是要查出他们的老根子。可是，党的领导人对这些同志却不是这样，就因为他们的言论或情绪与真正的右派分子有若干相同之处，就把他们从头

到脚、从小到大都给否定掉了。尽管这些同志已经乖乖地认罪认错，“缴械投降”，也仍然要搞臭骂臭，叫他们“脱胎换骨”。当他们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被愚蠢而冷酷的接生婆折磨得不如犬鼠，奄奄待毙的时候，还要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受到了党和领导人的宽大而“叩头谢恩”。面对着这两方面的事实，有人性者能不伤心落泪么？！这能劝人服罪么？很多人直到今天尚未被摘掉帽子，固然是不服罪；就是那些所谓表现好的已被摘了帽子的人，叫他们大胆地把心掏出来，是否已真正服罪，也都是值得疑问的。

前些日子，我们社内的原是党内的几个犯错误的同志在一起吃饭，听说毛主席为近几年的问题于心不安的消息时，大家的心情都是很难过的。据说，毛主席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几年来，我们干了大蠢事！”很显然，他老人家是很痛心的。不管这句传言是否属实，在我们的心上都起了强烈的反应。过去，我们对毛主席是有很多意见与不满的，今天，听说他老人家也很痛苦的时候，我对他反而抱同情与体谅的态度了。并且在给留在北大荒的正在闹情绪的一些朋友的信中，很真挚地谈到了这一点。这到底是什么感情呢？我也无能言喻。回想我从小在家，每当父亲打我、骂我的时候，我对他是十分恼恨的，抗拒不屈的心理非常强烈；当他为家庭的困苦而操心劳碌、忧愁烦闷之际，我却又伤心得流泪了，对他带给我的屈辱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今天，由于党对我的问题尚未予以公开地解决，我内心的痛楚当然没有消失干净。但是，我对党的感情——就像对我的家庭和我的父亲的这种感情——一直没有被磨灭掉。我在犯错误以后，直到生活得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我给家庭、给亲友的所有的信件中，从未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我一直谴责自己，而要他们永远地相信党和依靠党。五七年我被称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的时候，我的一个侄儿正在盐城高中读书。这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与拥护。他是团委会的委员和学级班的班长，并兼了其它很多种职务。但是在“反右”时，说他对我未能划清界限，未能“彻底地揭发”我，就把他的全部职务都给撤销了，险乎开除了团籍。而实际上，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还没有读书，以后只见过三次面，他能了解我什么？能揭发我什么？他当然会苦闷的、伤心和失望消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宽慰了他，鼓励了他，以我们党内许多位领袖从前受委屈时的可贵的表现去教育他。他终于变失望为有信心，变消极为积极，不到一年，就提前撤销了留

团查看的处分，恢复了很多职务。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考试时，他得到了优秀的成绩。按照这种成绩，他应该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或南京大学之类的高级学府，但是他被留在刚刚开办的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在这种时候，他又痛苦得怨天尤人了。我又教育了他。他学习得很好，毕业后到我们的家乡——阜宁县——做师范学校函授部的教员，工作很安心、很努力。我的另一个侄儿在徐州下桥煤矿做工人，我一直鼓励和教育着他。他已成了劳动模范和党的发展对象了。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我对党对革命的感情究竟如何。尽管我有过很多错误，对党的领导人有严重的不满，但是我没有因此而背弃党，以自己的痛苦和疑难去毒害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后代。在这里，我无心说漂亮话，更不是欺骗党。如果党认为有必要，可以向所有与我有通讯联系的人，把我给他们的全部信件都借来一阅，情况就不难判断了。

今天，当我们都能以冷静的理智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冒昧地建议党能够重新审慎地研究一下一般的右派分子的情况，尤其是跟随党革命多年的原是党内犯错误同志的情况，以便令人信服地断定他们究竟是不是“党和人民的敌人”。然后，如果条件可能的话，再把北大荒的这笔账重新算一下。<sup>4</sup>这笔账基本上有两个方面，摘了帽子的与没摘帽子的。对于前者，他们究竟好在何处，为什么？是真刀真枪的实干家和确实诚恳善良的正人君子呢，还是鱼目混珠、甚至连红萝卜也不是呢？对于后者，他们到底有哪些“坏”，为什么坏？是真正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好吃懒做的寄生虫、偷抢扒手的坏蛋呢，还是本质并不坏，只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的，被官僚主义分子与坏分子打击诬陷的呢？……根据我的体会，这里面的情况是异常复杂而微妙的，这笔账是难的算清楚的。一个人往往是坏中有好，好中有坏，甚至是好坏各半。但是，只要我们能尊重历史，对每一个人的命运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也不难水落石出。到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与形均可一目了然了，处理也会必然随之公正了。有些人如果并不像所说的那样坏，就应该摘去帽子；有些人确实表现不好，当然要再教育观察一个时候；对于已摘了帽子的，有的就是转变得很踏实，把他们的帽子早已摘去，当然没有错；有些是投机伪装，混过关的，那也不妨再给他们戴起来；而像盛桂林之流的血债累累、恶迹斑斑的大坏蛋，在材料齐备，甄别属实之后，

<sup>4</sup> 本页稿纸空白处有审阅此申诉的领导笔迹：“怎么称这笔账”。意为此种表达不妥或很扎眼。

哪怕他们已走到天涯海角，也应该把他们追回来，不仅要重新戴上帽子，而且要按罪行之轻重，给予法律制裁。对于农场中的一些坏领导与坏分子，也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以至适当的处分。

如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分别是非，挽回影响，使所有犯错误的人更进一层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是一丝不苟的，对人、对历史都是无愧的。对帮助别人进行改造的一些同志来说，这也是一项极为深刻而又生动的教育。他们会懂得：要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人和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需要怎样的刻苦、细致的努力。

经历过这几年的这种痛苦生活的人，尤其是经历了北大荒式的生活的人，情感上受到的伤害是惨重的。今天如果能以积极的态度回顾一切，他们一定会感到收获巨大和磨练之可贵，从而知道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如何正确而坚定地迈动自己的脚步。这时他们之进图未来将增加很大的信心与力量。相反，如果以消极忿怨的心情来对待过去的生活，必将会“往事不堪回首”，茫茫然而心有余悸。他们将背着这个硕大而沉重的包袱，在前进途中跟头踉跄，甚至踟足不前。要使这种人做到前一种人的样子，他们本人以及党和同志们，是必须要做出艰苦的努力的。

#### **丁. 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

到写这部《回顾》时止，我的心理与神情都是十分复杂的、矛盾的。我既不像一九五六年以前那样的乐而忘忧，不知天高地厚；也不像在东北后期的那种忡忡怏怏，忧伤怨尤。而是在忧愁愤懑中有着舒畅与振奋；在达观爽朗中亦有烦闷与彷徨。这种矛盾的瞬息万变的现象，反映了我们当前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我本人思想中的新与旧、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由此我才深深感到那些胸阔如海、高瞻远瞩的同志之可贵。在任何时候，他们皆能得而不忘形、失而不颓丧，淡喜抑怒，头脑冷静。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经过这几年的斗争，我的生活态度未变，我仍然愿意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点点滴滴的力量。它终于支持我克服了动摇、失望、消沉、悲观的情绪和企图毁灭自己的念头。我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回到编辑部之后，我一直为积累知识、提高和丰富自己而努力。有人说我这是求末舍本，而我却认为做得很不够。

有人从我的健康角度出发，劝我不要常常熬到更深夜静，但我觉得：“留得青山”而不用，也是徒具其表耳。

对资料工作，我本无兴趣，过去也很轻视。摸了近（几）年之后，始知其不易。它不仅需要科学的工作方法，更需要精确的记忆力。否则就不能了如指掌，得心应手。我在这两方面均很缺乏本钱。因而我对它比较重视了。同时，我发觉这项工作也可以提高认识和丰富知识，从而也渐渐地产生了兴趣。就每次具体工作来说，如突击抄写人物机构名册、选摘“毛泽东语录”、装订合辑本、接待资料借阅者和回答外来的电话询问等等，不论在办公时间或非工作时间，我都是比较认真负责和比较热情的。但是，由于思想负担较重，考虑问题较多，不习惯于细水长流的工作方法，影响了我对工作时间的充分利用和更好地熟悉与钻研业务。同时，由于历来生活散漫和身体多病，还未能弄成按时作息的习惯，常常有迟到早退（下午）现象。对于这些缺点，自己在注意克服，但努力不够。其根本原因是律己不严。当第一次林冰姿同志提出这是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时候，我曾经作了一番努力，常常不睡午觉而准时上班。不久，因睡眠不足而出现耳鸣现象，于是又自我体贴地松懈下来了。后来，章墨渊同志也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了反对特殊化的问题，我是更加重视了。这一阶段的努力比较持久，但胃痛加剧，肝也较前肿大，时而又出现轻度的耳鸣。由于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没有自我原谅，而在继续努力中。在同志们的善意的督促下，这一类的非本质的缺点是容易克服的。

在学习讨论提高自己方面，我抱着探究真理、不耻下问的态度，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一事一字，均能如此。在政治上，我首先敢于暴露思想，无讳己见，然后聆听他人教诲，会则更好，不会而别人有理者，从之；别人理不足者，容后再议，不强求他人从己。在业务上或学识的研究上，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哪怕是对一个字的读音或含义不甚了然，必立即求诸于字典、《辞源》，绝不含糊从事。

在生活方面，力求节俭简朴，习尚清雅。不故意为个人的安逸享乐花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经济上的困难与家庭的苦痛，给自己带来了忧愁烦闷，但也不是怨天尤人，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在事实上来减轻痛苦的程度；另一方面，埋头于学习与文学研究上，来摆脱和抑制这种烦恼。

在待人处世方面，我抱着礼尚往来的精神，我尊重别人，也不轻贱于己。对真、善、美者，热情歌颂；对伪、恶、丑者，也绝不客气。有人摆着老爷架子，打电话叫我把资料送去，如于长钦的老婆，我只能请她屈驾自来；有人客客气气，叫找好资料之后打电话要本人来拿，如沈平同志，我倒乐意给她送去。在和社外机关打交道时，对热情为人办事者，我感激敬爱；对敷衍塞责、冷淡无情者，我则要来个小小的抗议。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对现实不满，对党和政府有偏见，不能分清“九与一”，而我认为恰恰相反。我这是爱憎分明，是非分明，过去如此，今后亦将如此。现实生活中既然是善恶混杂、是非纷纭，而我们却一律与其“和平相处”，玉石不分，那就不成其为人，而是石头一块了。至于这里面是否带有个人情绪，我觉得也要分别对待，个人尊严与个人利益有不当的与必要的，也有过分的与不应有的。如属前者，则应该予以维护与尊重，否则，农民要求土地也是非正义的了。从东北返京时，我有意不睡卧铺，企图“节约归己”给久别的孩子们买些礼物。当认识到这也是一种错误时，我谴责了这种可耻的行为，恼恨不已；但是，当公安部门拖延刁难，不让我的孩子报户口，而给我的工作与生活造成麻烦时，我就不能不表示正当的愤慨了。

对于我的政治问题，我一直是反复不定、痛苦异常的。但我又无可奈何，只能抱定随党怎么办的态度。在居庸关绿化队时，有人告诉我：王锡九队长说我在东北改造的“最坏”。到资料组后，一些负责的同志在正式的会议上也说过：“比较起在东北的情况，现在有了点进步，但很不够。”言外之意：也是说我在东北“最坏”了。人们所以这样说，以及对我采取相应的态度，我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农场党组织提供的材料极不全面、极不公正，甚至是黑白颠倒，但是对家里的同志来说，他们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对此，我没有埋怨，也不应该有埋怨。我过去常说：认定是“敌人”，但是有朝一日，在国乱势危或爆发战争时，我将会表现出我仍然是个革命者。人们讥讽、辱骂我，甚至我们的孙书明同志也因此而对我冷齿。对这，我感到不舒服，但也能理解。我相信，只要有事实，而人们也均能以客观的、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实。过去的事当不难做出公正的结论，今后如何，更不难论断。

在日常的友谊活动中，对一般人，我是不与之往来的。他们既把我当作“空

气”或“瘟疫”，我当然也不愿意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sup>5</sup>就是对一些站得高、看得远、真正热情诚恳的朋友，我也尽量少去打扰他们，怕给他们带去“不测风云”。只有在盛情难却之下，才不得不登门造访，小作推心之谈。和我交往较多者，基本上是在北大荒共同劳动过的人。有些相处得宜，感情比较深厚；有些并非我所爱，但找上门来，我也尽量待之以礼。尽管有人一直怀疑我在搞“小集团”，怀疑我在进行反党的政治活动，而且我也发现了一些我受到监视与跟踪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依然坦然自若，毫无顾忌。有些朋友甚怕节外生枝，浪上复浪，想和我见面时往往约我到社外去，而我却邀请他们到社内来，到我的“寒窑”中白水叙坐。我觉得“只要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如果组织上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直接了当，不必捉迷藏，我将极为虔诚地提供一切事实和人证物证。另一方面，我对党的这种戒备行动也毫无愠怨。在东北，我常常丢失信件；后来叫家里改寄挂号或双挂号，也丢失多封，连几十斤粮票也被“没收”了。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以及他们把我当作重大节日中的防范对象，甚至要加以逮捕等等，我是十分气忿的。回北京后，在检查信件的问题上，我也有过疑怨，经过孙书明同志解释，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从那以后，我对党的一切戒备措施从未反感过。我认为，如果我的感触没有错误，也就是说，保卫科或其它组织真地有过监视和追踪我的行动，那也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党的利益要求的。我完全能够谅解。

关于小家庭的破与立，我也有我的哲学。与晓旅，原来的感情就有裂痕，这次分道扬镳毫不痛惜。但为了不伤害孩子们的心灵，我有过委曲求全的想法，后来证实她已有新欢，我也只好作罢。但是我并不主张双方视如仇敌或陌如路人，为了孩子的正常发展与宽慰父母之心，我们应该有来有往，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也要成为能够相互关怀的熟人。对此，晓旅也报之以冷淡或拒绝。这样我也只好听之由之了。当然，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能够躬责于己而原谅于她。

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办？是只身孤影地了此一生，还是求新重建，我偏重于后者，但又怕为孩子带来哀伤与痛苦。因此，当有人要为我“做媒”时，我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

---

<sup>5</sup> 从此段开头到此，有人用红笔划出红线，在稿纸空白处写：“骂的是谁”。

淡。如果晓旅日后回心转意，愿意常来常往，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诚。其次，要能同甘共苦，共患难，真正“不怕杀头”。对党提意见，结果能好也能坏。客观规律如此，不得不做两方面的准备。有此两条，就好办了。如果她出身贫寒，深悟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能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那就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了。年轻时的追求才貌的心理早已消失。过去有人说：“爱”而无心，只能是受罪的“受”，此话确实不假。这几年的艰苦生活，使我对人生的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人生在世，要为人类最美好的事业贡献一切，未变；要踏实工作，努力学习，未变；待人要真诚、热情，未变；但是，有关幸福、爱情、享乐、荣誉、友谊等观念中的不纯的部分都有所改变了。就从这一点出发，这几年的生活给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

### 结束语

六年来的道路，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深感对党不起。

也许有人会这样说：这是故作玄虚。因为综观全部材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处处对党埋怨。是的，在这个痛苦而复杂的过程中，我对党的某些组织及某些领导人的作为，是有怨愤的。但是，对党，尤其是在党让我说出了要说的话之后，我只能这样说：我有愧！

多少年来，党对我的教育不能不算耐心细致，党对我的恩遇不能不算义深仁厚，党对我的信任与期待不能不算真挚与殷切。然而，我愚昧妄大，刚愎自用，对党的若干缺点不是采取最善意、最妥当、最有效的方法帮助党进行克服，而是轻则指责，重则怒骂，等于对党扬恶隐善，以怨报德。党对我不得不当头棒喝。之后，我接受了一定的考验与磨炼；可是，由于修养不足与个人主义意识的蒙蔽，很多时候缺乏清醒自觉，给自己造成无数的烦恼与痛苦。“改造”的结果，不是摆脱一切羁绊，恢复往日之积极、热情、坦率与振奋，而是对党疑心重重，失去信念，满身是颓丧与消极。幸而在回到北京之后，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教育与期待下，积极的思想因素终于在我的头脑逐渐扩大了阵地，使我基本上能够正确地批判以往和展望未来。

毛主席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往往不能够很快地认识到它；只有在认识

它的时候，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它。”事实的确是这样。在经历北大荒的生活时，我是不愉快、不自觉的感触很深而不解其寓意。今天，当我能以批判的态度返顾往事时，我才深深地感到它是异乎寻常的珍贵。也许正是由于它在自己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痕迹，才迫使自己常常去回想它、细察它，揭它的盖子，剖析其中的奥秘，从而使自己懂得了现实之芜杂，人生之甘苦，除一祸，得一福委实不易。它也像生活的一根录音带，录下了我的一切：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哪些地方想对了、说对了、做对了，哪些地方正相反。

归纳一下这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应该永远相信党，坚定地跟着党走。在任何风雨飘摇，形势危急之际，都不能对党发生动摇、怀疑、悲观和失望，哪怕是一刹那的也不应该有。必须永远记住：不论在什么时候，党都是像党纲上所写的那样：“英明、正确与伟大的”。即使我们的错误偶尔地超过了成绩、使革命事业受到惨重的损失，那也是党内部分成员的失策于一时，或蜕化变质的结果，而不是党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时应该坚定地相信党，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和他们一道，向困难、向错误，进行果敢不懈地斗争。任何的埋怨、责骂都无益于事，消沉或盲动只能涣散队伍。我过去对党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把某些人与整个党混为一谈，是十分愚昧的。我所以落得今天的下场，也可谓“以首破壁，自作自受”。

二、人人需要改造，我尤其需要。这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从世界观、人生观到作风、性格，我都有一系列落后、愚蠢、脆弱、庸俗的因素。它们常常闭塞了我的视听，混乱了我的思路，使我不能正确地认清现实生活的全貌，找到通向理想境界的捷径。只有不断地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力求自己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吻合，并巩固正确的人生观，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作风逐渐移到正确的位置上去，才能为党做出一些好事而不至于再犯重大的错误。

三、我要改造得好，必须首先克服个人主义。过去的十几年中，我有过爱好虚荣、骄傲自高、追求名利与享受的思想。到犯错误前夕，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狂妄不可一世的地步；犯错误之后，又一度陷入患得患失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庸俗、低级、可耻的，它们是使一个人发生动摇、堕落和遭到失败与毁灭的渊源。一个立志于革命的人，如果掺杂了个人主义的动机，即使在某些方面侥幸地获得成功，就不纯的思想动机来检查，也仍然是

丑恶的、有愧的。如果再把别人的功绩算到自己的账上，则更是贪天之功，夺人之利，为众人所不齿。何况个人主义意识浓郁的人，失败往往要多于成就呢。我多年来的切身教训之一就是：个人主义的毒素时常抑制或湮没了思想中原有的积极因素，使我不能向党和多数同志靠得更紧，而是若即若离，经常发生混乱与不和。就以这一点来说，我也不应该被继续留在党内。现在，我对狂妄自大、追求名利的丑恶思想已作了彻底的清算与洗刷，但患得患失的余毒和其它一些不健康的意识尚没有得到有效的消除。它们是我的思想情绪易受到波动的原因之一。我不会和它们“共存”下去。

四、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困难的生活，我不仅获得了许多生产知识与生活经验，而且——主要的——使我对劳动人民的甘苦与爱憎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没有劳动人民的艰辛努力，就不会有人类，就不会有社会。只有他们的勤奋劳动，才是人类的幸福与知识不断获得充实与丰富的根本保证。因而我更加尊敬他们，崇爱他们，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苦痛而苦痛。对旧世界的剥削阶级、横行霸道的势力及其它一切吮吸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我是更加憎恨了；对受到这些余毒的侵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继续危害人民的一切破坏势力与黑暗现象，同样也是我所十分厌恶的。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磨炼是一课最生动、最有力的阶级教育，它使我的阶级感情更加深厚了。今后不论何时何地，我必将和一切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的罪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五、生活使我初步地懂得了辩证法。“胜利中孕育着失败，失败中孕育着胜利”，“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对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我现在都有了比较真切的体会。孔子曰，“知耻近乎勇”，“问过勿惮改”，“改之为贵”，事实的确如此。过去，我虽然戴着一顶共产党员的帽子，似乎也“身高位显”，实际上轻浮浪荡，根底浅薄。这几年来，处贱居危，喘息于万众足下，反而觉得真正地领悟了一些道理，扎实而无华了。蒙古的谚语说：“骏马不在于鞍子好，人美不在于衣饰好”。我离“骏马”、“好人”还远得很，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骏马”，但是我知道如何为人立志，正确而又坚定地走完后半生的道路。如果说，这几年来的遭遇也算作一次惨痛的挫折，那也不过是挫去了我身上的一层污垢和“虚假繁荣”，我获得的确实更坚强的信念与充足的力量。俗话说：“淋过大雨的人，就不怕露水”。而对我来说，以后就是挨鸡蛋大的冰雹，也不会有任何畏惧

了。

一言以蔽之：体会感受是很多的，无需一一赘述。

在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之余，我也反复地省察了由记事（者）直到犯错误前后的一切荒唐、幼稚的思想与言行。我不仅批判了政治思想上的是非曲直，更检视了对人生的态度及为人道德品质方面的善恶与正误；我不仅为许多已成事实的错误言行而悔恨自己，并且为许多一闪即逝的庸俗、愚佞的意念对自己进行了谴责。想到了这一切，我又不能不感激党让我走了这一段艰险的道路。如果党不给我狠狠地一棍子，使我感到痛楚，慢慢冷却下来，我不仅不会忍受这种狂风急雨式的冲洗，就连潺潺细流般的清涤我也会拒绝的。到头来，我必将被自己煽起的大火所毁葬。所以说，虽然党打得我很疼，在疼时，我还有过哀怨；然而在痛定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党这是挽救了我。也许，“棒下出孝子”的手段不适用于每一个有了错误的儿女；可是对我这个浪子来说，却是因人而宜的。鲁迅先生在讽刺当代的民族性格弱点中的折衷主义的通病时，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你提议把墙上的小窗洞开得大一些，每放点光明进来，他们会说这是多事；而当你怒气冲冲，要把整个屋盖子都揭掉，开个大天窗时，他们又会说，把墙上的小洞扩大扩大，多搬掉几块砖就满好了，而且很慷慨地提出：用透明的玻璃代替灰暗的窗户纸。”过去的我，也是这么一个可笑的人物。如果一开始，和风细雨地说我有如何严重的错误，像五六年冬天邓岗等同志与我开谈心会的那样，我会以牙还牙，拒善言于万里之外；而此后，当自己被叫做“人民的敌人”的时候，则又希冀于有朝一日，把我只当作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就好了。

我写这么多，也只是我这几年来情况的梗概，而不是全部；关于北大荒的情况，也不是它的全部。在不少地方，不是偏重于反省和检查，能会给人以申诉、辩护的印象。如是，乞望原谅。几年来，我认为党和许多同志对我的内心世界是不甚了解的。有人了解，但由于原因诸多，而又不能为我代言。因此要把我的情况向党交代清楚，只能求诸于己。在北大荒时，有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感叹地说，也许只有在若干年后，写出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才能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展示于世人之前，使其得知我们的是非明暗、善恶优劣，从而得知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的最后一种悲剧中如何做人。这对子孙后代来说，也不无教益。现在，我觉得无须那种旷日持久的彻盼，党已经开始毫察以往，去垢剔尘，重新高举发扬民主、

实事求是的大旗了。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在地把一切情况向党说个明白，党会给我们做出新的、正确的结论来的。

当然，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党或任何人同情自己的愿望。在党作出新的决定之前，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过去的决定；如果新决定只是旧决定的延续，我也只能服从，在服从的前提下，保留再提意见的权利。如是，我就很满意了。

感激党和同志们给我以机会，给我以权利，让我说出了想说的话。如果党和同志们认为我的思想很混乱，有很多观点有待于纠正，我希望能及时地启发我、教育我。俗话说：浇花要浇根，教人要教心。只要党能以真理说服我，我相信没有拉不直得绳子，没有改不了的过错。同时，我自己也要加强改造，刻苦学习，使自己的立场观点早日与党的一统起来。也有这样的俗语：听人劝，得一半，自己跌倒自己爬。一方面有党的教育，另一方面自己又能“改错要狠，做事要稳”，我相信，我会很快地摆脱一切包袱，步同志们的后尘，急起直追。如果党认为我所交代的情况还不够全面、不够细致或不够确切，甚至与组织上所掌握的材料矛盾重重，我恳切地请求党立即提出来，我将尽我的最大可能与诚实，最迅速地回答党的疑问。事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只有把它们都亮出来，经过甄别与明辨，才能清沙消雾，还事物本来之面貌。

在写这本材料的过程中，我得知前线紧张，准备反击蒋匪帮窜扰的情况；接着又见老的军事记者们纷纷回到军事组开会，不久就被派赴前线各地。对此，我是很有感触的。过去我还希望这能够早日解决问题，很快回到党的队伍，也许还能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役，贡献自己的特长与些微力量，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幻想了。莫说是我，就是早在两年期前就被摘了帽子的李耐因，也没能与自己的老行当沾上边。在过去的国内战争中，常有这样的事：早上是敌人，晚上就成了自己人，并且把步枪和刺刀发给他，相信他能为我们打仗；曾泽生在长春起义后，也不过只隔了两年，我们就相当地信任他，叫他率领一个军到鸭绿江那边去打侵国强盗。这一切当然都是党的利益所需要的。现在，自己的同志在犯了错误之后，并且改正了，不能被信任，不能到革命最需要、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虽然党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改正了错误，党会像过去一样地看待他们。看来事实远非如此。对此，我也只能看做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因而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几千年来，有骨气的仁人志士只习惯于“士为知己者死”、“耻以不见信”或“见疑而羞

于生”。今天，作为一个革命者，当然不应该如此，而应该把“见疑”与“不见信”也当作接受考验的形式之一。但是，就我的激情来说，我是多么渴望着奔赴疆场啊！为革命而死，比苟活百岁还要幸福百倍！！（全文完）■

一九六二年六月廿六日夜完成

### 【读者来信】

#### 1. 袁洪权谈 124 期之得失

由友人转来《记忆》第 124 期，这是我第一次读该刊，一口气读完，获益匪浅。因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兼及共和国历史，特别是共和国前后文学转型的细节性关注。这里，我主要谈对两篇文章的阅读感受。一是丁东老师的《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此文写得很精彩，富有理论的启发意义。去年十月份，我才对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毛宪文先生做了口述采访，知道口述采访文字的“震撼力”。不过，口述史的整理越来越麻烦，特别是文字的发表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篇文章是启之的《“脱裤子”·“割尾巴”·“洗澡洗手”——“红色话语”小议之一》，此文对延安以来的思想改造术语进行了部分考证，我很喜欢这种梳理方式。不过，第十页关于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的相关论述，其中提及这样的文字：“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先割喉后切腕。”这些关于沈从文的文字，真实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跟启之先生的大作的论述是有差距的。把沈从文放置到这样的叙述框架之中，个人觉得欠妥，沈从文当时并没有洗澡之说。至少，这是史料使用上的“硬伤”。

真诚感谢《记忆》编辑部同仁能够坚守对历史真实的记载，这样的刊物在当今的环境中是难得的，我期待继续读到这样的珍贵文字。

2015年1月31日

## 2. 孙沛东谈李南央之文

李南央老师的文笔，我很喜欢，平实而质朴，又饱含理性和思考。她的大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不管面对的社会学，还是历史学的学生，每学期我都会让学生阅读这篇文章，上个学期，还让学生将这篇文章与萧军的《延安日记》，以及《耳语者：斯大林时期的私人生活》对照阅读，让他们思考党文化对于个人道德及其家庭生活的影响。同学们都很喜欢，也有很多深入的讨论。谢谢作者！

2015—2—2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